



·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

# 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

钞晓鸿 郑振满

清史是指清朝从兴起至衰亡的一段历史。其中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拥有自己完整体系的独立学科。本文是从清史本位回顾 20 世纪的清史研究，显然不能因为近代史体系的存在而割舍晚清部分，损害清史研究的完整性<sup>①</sup>。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史”与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已作了一系列的学术回顾，从而为人们把握 20 世纪特别是 50 年来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方便<sup>②</sup>。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从清王朝的整个历史出发，关注 20 世纪清史研究的主要线索、时代特征、问题意识以及重要的学术积累，尽管这一思路不可避免地遗漏不少史学成果甚至重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就，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在相当有限的篇幅与时间内对 20 世纪清史研究进行回顾的最好方式之一<sup>③</sup>。本文拟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清史研究取向略作评述，再对若干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试作总结。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 研究取向与时代特征

### （一）1949 年之前的清史研究

严格说来，清史研究可追溯到清代的本朝史研究，不仅官修与私撰的各种本朝“历史”连篇累牍，中央至地方还建立有专门的修撰机构（如国史馆与方志馆等等）。有的作者即为当事人，有助于增强叙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处于本朝的历史局限性，有的著述反而更多地带有欠缺与歪曲成分，对满族早期历史的隐讳、对部分《实录》的篡改，就是例证。尽管今天看来大部分著述在当时扮演着维系朝政国纲、教化安民的角色，而且大多以记叙为主而缺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律性分析，研究的成分不足，但它们毕竟是后来清史研究的最初源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通贯有清一代的清史研究才逐渐展开，而此时的 20 世纪已经走过了前 10 个年头。

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传统的王朝统治形式在中国的终结，骤变的政治形势与复杂的社会现实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复杂性，不同的立场观点也反映在清史研究之中；同时，清朝历史与当时现实的紧密联系，后世修前朝历史的长期传统，也使得人们对撰写清史充满热情。清亡后不久，就有各种各样的清史著作问世，其中一些即在此前撰述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如《清史纲要》，记述了从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有清一代的历史，据《例言》，“本书道光以前各卷，脱稿于数年前”，可见该部分在清朝灭亡之前即已编就<sup>④</sup>。汪荣宝、许国英的《清史讲义》，

① “清史本位”并非王朝本位，后者正是 20 世纪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反对、扬弃的研究取向之一。

② 就大陆而言，除了近 20 年来《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等刊发的年度与专题述评外，也有就此前较长时期所作的研究综述，如《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1986 年），陈生玺、杜家骥《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年），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 年），曾业英等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另外，部分相关著作也有相应的研究回顾，如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 10、1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999 年）。由于其他专题综述为数甚多，恕不一一列出。本文也参考了上述论著，谨此致谢。

③ 为紧扣清史研究的主要线索、时代特征，也囿于涉猎所及，本文基本以大陆出版物（含部分译著）为限。

④ 吴曾祺等：《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 年初版，此据 1925 年再版本。

从努尔哈赤起兵一直写到民国建立,其中太平天国失败之前部分,由汪荣宝编写,此部分实本于汪氏所著之《本朝史讲义》,查《汪荣宝日记》,后者在宣统元年“四月初六日”已正式完成<sup>①</sup>。

然而清亡之前完成的清史著作,在清帝逊位后的引用与整理出版,前后却发生了若干变化。《清史纲要·例言》指出,“凡人民抵抗官吏之举动,大都由政治不良而起,即有一二魁杰但为少数人谋私利,并非救民水火,亦究与寻常窃盗行为不同”,所以本书将官书奏报中的“寇贼”、“逆匪”等字样予以“删”、“改”。再以上述《本朝史讲义》与《清史讲义》为例,除了将“本朝”改为“清朝”、“发祥之由来”改为“清世系之由来”等等因时过境迁而作的例行修改外,其他如,“太祖伐明之原因”,改为“太祖仇明之原因”,“桂王之割据”改为“明永历帝之割据”,尚之信、耿精忠之“伏诛”均改为“杀”,“洪秀全之大乱”改为“太平天国之勃起”等,则反映了两者在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方面的显著差异。在汪、许二氏的《清史讲义》中,还写有“郑成功之沿海侵略”,但数年后在许国英的《清鉴易知录》中即变为“大举进攻”<sup>②</sup>。陈怀的《清史要略》虽对太平天国仍用“内乱”一词,但为其失败而惋惜,该书直接抨击清政府,说“(慈禧)太后骄侈淫佚”<sup>③</sup>。这一系列变化反映了该时期的清史著作中,对满清王朝尊崇的日益衰微,而对清朝年间部分反清运动的逐渐肯定。

当然这只是总体趋势,并非所有的清史著作都持上述立场。例如诸葛汝楫的《清史辑要》,记事“从开国之原”至“共和告成”,对一切反清运动都持否定态度,视其为“贼”、“匪”,太平天国也不例外,将其称作“发逆之乱”,说“发逆洪秀全倡乱于广西”,“发捻回诸匪,纷纷而起,民遭涂炭,且与英人启衅,连年用兵,东南各省,糜烂已极”;反而对清代的官员表示同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陷江宁省城,总督陆建瀛等殉难,贼遂据为伪都,僭号太平天国”<sup>④</sup>。

除上述论著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其他一些包括整个有清一代的清史著述,如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刘法曾的《清史纂要》,1915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蔡邕的《清代史论》,甚至有的著作已不知作者是谁,如1918年上海文明书店出版的《清鉴辑览》。另外,翻译著作也陆续问世,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经但焘翻译后,191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专题研究方面,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考证学”与“今文学”为主线,纵论清代学术,在此基础上,梁氏又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析清代的学术流派、学术变迁与学术成就<sup>⑤</sup>。太平天国史研究也逐渐展开<sup>⑥</sup>,至于其他的清史论文、译文则更多。

30年代之前(包括1930年)清史研究的突出成绩是三类重要的清史著作问世:官修的《清史稿》,孟森的《清朝前纪》等系列清史研究成果,萧一山独撰的《清代通史》。无论就详瞻程度、史实考订,或是资料发掘、篇幅部头而言,皆非此前清史著作可比拟。

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编纂纪传体清史。由于时局动荡、经费支绌等客观原因,加之修纂人员态度、水平各异,各部分的完成时间与质量也参差不齐,在未经纂修人员通阅全稿的情况下,即于1927年仓促付印,取名《清史稿》。书中前后抵牾、观点偏颇、史实残缺、内容错谬之处不一而足。1929年故宫博物院聘请专家审查该书,列出19项罪状,《清史稿》也因此遭到政府查封,但此举反而造成洛阳纸贵,印刷私售不胫而走。平心而论,《清史稿》于清亡后不久,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以空前的篇幅、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有清整

① 汪荣宝、许国英:《清史讲义》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汪荣宝的《清史讲义》是作者在京师译学馆的讲稿,原名《本朝史讲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4辑(第93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汪荣宝日记》宣统元年四月初六日载:有人求购《本朝史讲义》版权,“余答书允诺。今日将《讲义》目录写定,并自为题词一首,缀诸卷端”。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63辑(第62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② 许国英:《清鉴易知录·正编一》,1918年初版,此据王钟翰校阅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 陈怀:《清史要略》第3编(第13章),此据北京大学出版部1925年再版本,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第42页上。又据该书版权页,写有“中华民国九年二月初版”,即1920年初版;各卷署名为“瑞安陈怀孟冲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编《(1900—1975)七十六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说《清史要略》的作者是“陈怀、孟冲”二人,又说为“北京大学出版部”“1910”年出版(其他论著亦有持此说者)。其实此书作者即为浙江瑞安人陈怀,孟冲是陈怀的字,而非另一作者。

④ 诸葛汝楫:《清史辑要》,此据《鉴史辑要》附录本,福音印刷合资会社,1914年,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第57—59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初版,此据1927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志书店,1926年初版,此据1929年版。

⑥ 李法章:《太平天国志》,华新书社,1923年。

个一代的历史,同时也部分地适应清代的具体状况而增添了交通、邦交等志,其功绩是不能抹杀的;编纂者态度、水平不一,各部分的优劣得失自不能一概而论之。至今,该书依然不失为清史研究的基本参考书目之一<sup>①</sup>。

孟森的清史论文先在《东方杂志》等刊载,1916年商务印书馆将其部分论文汇编成册,出版《心史丛刊》1集,后又出版了2、3集,收入了《奏销案》、《科场案》、《横波夫人考》、《孔四贞事考》、《董小宛考》等重要文章。在此之前,孟森曾有《心史史料》刊行,他在《心史丛刊》1集自序中提到,“向刊‘史料’一册,萃萃大事为谈清史者所必留意”<sup>②</sup>。在《心史史料》与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孟森推出了《清朝前纪》,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的清史研究面临不少困难,但有两种情况十分突出:一是清朝对入关前的历史(如臣属于明朝)多有忌讳,大量与此相关的史实与史料被隐瞒、篡改甚至焚毁;二是清朝灭亡后,天子皇室从国法厉禁而成为百姓的公开话题,各种传闻在社会上蔓延,且不少以诋毁清朝为能事。孟森就是要将清朝所隐晦的史实揭示出来,将对清代的诬蔑澄清与纠正过来。在《清朝前纪·叙言》中他说到,“清一代在入关之初,以关外事实为忌讳。……易代之后,禁纲尽除,吾辈不能继先民忍死留待之意,为之胪列发扬,以成信史。徒据清世矫诬捏造之本,作成一代之史,是国民果可欺而国史真无足轻重?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也”,“虽不信官书,亦不轻信世俗之传说”,抱着“总使史书为征信而作”这一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考释满洲、女真、建州以及从猛哥帖木儿至努尔哈赤的历代先世。孟森这种学术态度与系列研究成果,对清史走上真正的研究之路具有重要的示范与促进作用,从而被视为20世纪清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这一研究风格至今仍为部分清史研究者所继承。

萧一山独撰的《清代通史》上卷,1923年已经完成。他主张清史是清代的国史,而非爱新觉罗王朝史,据该书上册《叙例》,“盖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至1925年中卷完成,《清代通史》的字数已逾百万。此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又刊印了该书下卷(两册,其中最后一章为“维新事业之发端”),至此,《清代通史》的基本格局已经奠定,此后的不同版本均是在这一基础上再版、增订而来的<sup>③</sup>。尽管该书存在错谬之处,加之引用传闻轶事,受到学界批评。但当时作者不及而立之年,能以个人之力,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撰就这一空前篇幅的章节体清史巨著,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有清一代(至晚清)二三百年的历史,实属难能可贵之举。另外,该书肯定太平天国、天地会等反清斗争,颂扬民族革命,与纪传体《清史稿》的立论观点、体例形式形成鲜明对比。若从篇幅部头而言,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还没有一部同类的著作可与其抗衡。

纵观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清史研究,主要的成绩与特点有:

第一,清朝早期历史的真相被相继公诸于世,对清朝的诬蔑与有关清朝的传闻正在逐渐得以纠正与澄清。其中以孟森的贡献最大,《心史丛刊》与《清朝前纪》交相辉映,既不诋毁满族与清朝,又要将其所隐瞒的史实揭示出来,推动清史研究走上客观求实之路。

① 对《清史稿》的评介,详参朱师辙《清史述闻》所辑的“清史评论”部分(三联书店,1957年,第182—432页),又参秦宝琦《“关于〈清史稿〉的纂修与评论”简述》(《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港台学者对该书从档案、版本以及研究资料汇总等方面所作的考察分析,颇值得参考。

② 孟森:《心史丛刊》3集合刊本,大东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初版”即1936年初版(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1900—1975)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认为大东书局“1934”年出版恐有误(第36页)。又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心史:《心史史料》,时事新报馆,1914年出版。

③ 不少论者在《清代通史》完成时间、早期版本等方面出现疏误,例如,有著作认为“1926年完成中卷”,其中上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版”;也有认为“民国十三年夏”上卷行世;还有认为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中两卷。目前大陆比较流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的影印本,但“影印说明”中也存在错误,如说“本书上卷于一九二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中卷相继问世)”(中华书局,1986年)。笔者以为,上述部分错误很可能来自于对萧一山后来一段话的误解与简单推论,萧氏1944年5月曾追述说,此前的《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不二年中卷亦出版,共约一百二十万言。后皆归商务印书馆印行”(《清代史·后记》,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307页)。但“十二年上卷出版”未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二年中卷出版”未必是次年即1924年出版,“后皆归商务印书馆印行”也未必是同一年印行。实际情况是:《清代通史》最早由北京中华印刷局出版,其中上卷1923年出版;中卷1925年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图书馆藏本)。本文所据为商务印书馆本,其中上卷《叙例》作于1923年11月18日,1927年9月出版;中卷《叙例》作于1925年9月28日,1928年9月出版;下卷之一、二均为“北平文治学院讲稿”本(据封面所题),未署刊印单位及年月(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

第二,完成出版了若干通论性清史著作。其中《清史稿》与《清代通史》虽存在各种缺陷甚至错谬之处,但若从同类著作的详赡与篇幅而言,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尚无出其右者。前者屡经校勘增订,后者迭经作者充实,成为20世纪清代通史的代表之作。

第三,几乎所有的清代通论性著作均把清朝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鸦片战争通常被看作道光年间的重大事件,而非清史研究的前后分野。在清史阶段划分中,似乎更加强调乾嘉之际作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

第四,传统体裁的清代部分或清代尚未完成的著述得以续修、完成,一些清史资料逐渐整理、出版。传统史书体裁除纪传体的《清史稿》外,其他体裁如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等,继《德宗实录》在此期间完成后,又继续编纂宣统实录即《宣统政纪》。某些清史资料得以刊布,如清国史馆的《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28年)。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等逐步进行档案整理、刊布。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或时代局限,若从大多数著作观察:其一,立论往往有失偏颇,或肯定清朝,进而为清朝歌功颂德,肯定其文治武功也包括有镇压反清起义及文过饰非之辞;或否定清朝,甚至将反对清朝专制与反对满族混淆起来。除民族革命史观外,天命观、英雄史观也有一定市场。如《清史纲要·例言》中说:“其实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本无定位。”《清史要略》谈到清朝灭亡时说:“或曰清之兴也,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清之亡也,以摄政醇亲王载沣,以摄政始,以摄政终,先后一辙,岂非天哉?”<sup>①</sup>由于历史局限性,甚至孟森这样的学者也不例外,“他把一代的兴亡治乱归结为帝王将相等少数统治阶级首脑的奋发有为和荒淫燕嬉”<sup>②</sup>。对于唯物史观,在清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反对声音,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叙例》讲到:“近世‘唯物史观’(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他认为,“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盖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清代通史》正是从这三者“均衡”的角度进行论述的。

其二,一些附会传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史研究。早期的清史著作更是如此,如陈怀《清史要略》第2编第9章即记载雍正“为某女侠所刺也”。这些正是孟森着力批评、力图纠正之所在,《清朝前纪·绪言》指出,“盖清帝逊国以后,国人以习知清世禁网之密,清纪载之难信,于是妄造誓说,流传失实,多污蔑清室之谈”,“……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从流俗好奇之听。”

其三,多叙事而少论说,有排比资料之嫌;传统体裁如编年体仍比较流行,章节体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清史纲要》即为“按年编次”的“编年体裁”。《清鉴辑览》,也是编年体。《清代史论》,以朝代为经、事项为纬,“就清代十二朝之内政外交,提纲要”,“备述颠末”。《清史要略》虽然分为编、章,但各章分别记载某一或数个事项,实类似于纪事本末体。这些著述一般仅对清代的重大事项进行简单勾勒,有些甚至是对原始资料的排比汇总、增删修改而成,缺乏学术性分析<sup>③</sup>。

其四,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还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与保护,“八千麻袋”事件就是例证。1921年,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此前整理档案时比较零散的约八千麻袋档案作为废纸卖给了纸店,罗振玉后以3倍的价格将其买回,除挑选整理外,又转售于李盛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终从李氏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几经辗转周折,这批档案虽免遭灭顶之灾,但亦损失严重。

不过到了三四十年代,以上的某些不足则不同程度地得以纠正。

在前一时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孟森推出编年体的《明元清系通纪》,“以明代之纪元,叙清代之世系”。该书在取材立论方面均经鉴别斟酌,“盖慎之又慎”,不能纪年者,作为“前编”,“正编”15卷,则逐年考证清朝先世事迹,从明初直至嘉靖年间,“既为《明史》所削而不存,又为‘清史’所讳而不著,则此一编正为明清两史,补其共同之缺也。”此书的功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sup>④</sup>。如果说《明元清系通纪》是针对入关前清朝先世的史实考释的话,那么《清史讲义》则主要是对入关以来(至咸同时期)清朝历史的论述。30年代孟森在北京大

① 陈怀:《清史要略》第4编(第4章),第14页上。

② 商鸿逵:《编辑说明》,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

③ 当时也有清史著作对传统体裁提出批评,如汪荣宝《清史讲义·绪论》、萧一山《清代通史·导言》等。

④ 孟森:《明元清系通纪》,见《自序》与《前编》起始部分。该书未署出版单位及年月,《自序》作于1934年9月“前五卷刊行时”,由蒋梦麟题写书名,据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目录,为“北京大学”刊行。有些论著认为此书原名即

学授课时,撰有《明清史讲义》讲稿,后来清史部分单独印行,书名《清史讲义》。该书首先讨论《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强调客观公正地评价清代的历史地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重申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sup>①</sup>此外,他还出版有其他清史论著,考证史实,否定传闻;不仅自己伏案钻研,在南京、北京讲授清史,而且呼吁解禁《清史稿》,亲自编纂检索资料,以推动清史研究<sup>②</sup>。

前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虽数百万字,但严格地说还不是一部包括整个有清一代的清代通史,且篇幅庞大,翻检阅读不易。40年代,萧氏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清代史》,此书实为《清代通史》的简写本,而且包括整个清代兴亡的历史。全书以“民族革命”思想贯穿始终,将郑成功视作“民族革命之倡导者”,最后一章为“民族自觉与国民革命”,已经写到了宣统退位之后<sup>③</sup>。

三四十年代,谢国桢出版了一系列明清史料与学术史、政治与社会史专著,如《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清初史料四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1932、1933年),其中前者考录入关前清史史料,评述中外清史研究论著,已部分地具有研究指南的性质。又如《顾宁人先生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商务印书馆,1930、1932、1934年),考述了谱主的生平、学术与交游。此外还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清初流入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年)等。40年代,郑天挺所著《清史探微》也出版发行。该书收入了作者三四十年代的清史论文12篇,内容涉及满洲礼俗、制度与血缘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如《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多尔袞称皇父之臆测》、《满洲人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等重要文章,有的论文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有的则进一步完善了孟森等人的某些观点<sup>④</sup>。

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整理也足堪称道。如前所述,中央研究院从李盛铎处购得大量档案后,由傅斯年与徐中舒负责,李光涛等人具体整理,从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至1947年已整理完成了丁编<sup>⑤</sup>。晚清部分则有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商务印书馆,1931、1934年)、左舜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中华书局,1926、1933年)等。故宫博物院在档案资料的整理刊布方面则成绩更大,据统计,从1929年至1948年,编辑出版了如《筹办夷务始末》、《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清代文字狱档》以及各种清代档案与档案目录约50种。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前贤们为档案的保护与整理,付出了心血与汗水<sup>⑥</sup>。

另外,一些专题研究在该时期也受到重视。首先是太平天国史、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与资料整理。如王钟麒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商务印书馆,1935年)、《太平天国杂记》第2辑以及《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郭廷以则进行太平天国史的专题研究与史

《清朝前纪》或《满洲开国史》,这恐怕是对孟森若干说明的误解。《明元清系通纪》前编一开始讲到,“此书先称《清朝前纪》,后又作《满洲开国史》”,作者在这里实际是说该书与此前二书之间有渊源关系,而不能简单地仅从字面下结论,在上句话之后孟森紧接着说,“迭经整理及补充,遂将清先世在明代一一可纪以年岁。”又据孟森《清朝前纪·叙言》,“今分未入关以前为《清朝前纪》,先作本科讲义之上编,别条纪入关以后之公案为下编,以次讲述焉”;可见《清朝前纪》最初是作为教材而出版的。若具体比较《明元清系通纪》与《清朝前纪》,两者之间无论是体例还是篇幅,均大相径庭。再据商鸿逵《述孟森先生》一文所述(收入孟森编《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心史史料》于1914年刊行,其中的第一、第二部分,加上之后撰“太祖”纪,共11篇,“合称《清朝前纪》”,作为在南京的教学讲义使用。后来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将太祖部分裁去,但仍留有目录(“第十讲太祖新纪”),讲义更名为《满洲开国史》。“继而专力从事编纂《明元清系通纪》……《通纪》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出十五册,未及完成全稿,夏(忱)愤国难辞世”。

- ① 孟森:《清史讲义》,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149页。据该书目录,最后一章即第5章是“咸同之转危为安”,最后一节为“第六节平回”,书末“附:俄还伊犁始末”。
- ② 孟森:《清初三案疑案考实》,未署出版单位及年月,据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目录,为1935年北京大学印行。《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收入朱师辙前揭书。
- ③ 萧一山:《清代史》(原名《清史大纲》),此据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 ④ 郑天挺:《清史探微》,1946年初版,此据独立出版社1947年再版本。
- ⑤ 《明清史料》乙编、丙编分别于1935、1936年出版,1947年丁编完成,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后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根据运往台湾的明清档案,又将《明清史料》编至癸编(1953年戊编、1957年己编、1960年庚编、1962年辛编、1967年壬编、1975年癸编。1985年,中华书局又影印出版)。
-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1—13页。

事编年,著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商务印书馆,1937年)、《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6年)。罗尔纲在进行太平天国史的探讨中,进一步扩展到清代的兵制与军事史研究,著有《太平天国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太平天国史丛考》(正中书局,1943年)、《太平天国史考证集》(独立出版社,1948年)、《捻军的运动战》(商务印书馆,1939年)、《湘军新志》(商务印书馆,1939年)、《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1945年)以及《晚清兵志》(1942年完成,但当时未出版)等等。太平天国史资料也陆续出版,并将收集范围扩大至海外,如萧一山的《太平天国丛书》<sup>①</sup>。秘密社会方面,由于该组织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又受到清政府的打击,资料不易搜集,这一时期则有一系列资料与研究问世,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国立北平研究院,1935年),收入自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搜集的天地会文献,并辑入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他撰写的《天地会起源考》一文。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3年),则公布整理了国内的天地会资料,也收录有自己的《水浒传与天地会》这一研究成果。

其次,中外关系史、边疆史的研究与资料整理。如前述故宫博物院整理出版的档案中,就包括嘉庆与道光朝外交史料、光绪与宣统朝的中日交涉史料等。一些研究会也积极进行相关资料与研究成果的整理出版,如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从《清会典》中辑录了清朝对边疆地区进行管理的资料,以《清代边政通考》为名于1934年出版;中国边疆学会主编、余贻泽编著的《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4年)一书,除明代外,主要考察了清代的西南土司制度。在中外关系史的通论性著作中,清代占有很大比例,如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也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问世,如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1辑(独立出版社,1944年)与《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对中外关系与边疆史的重视与研究,与中国当时民族危机加深、中外联系进一步增多有密切关系。

再次,以前十分薄弱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有相关专著出版,如梁嘉彬《广州十三行考》(南京国立编译馆,1937年)、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以清代部分为主等。值得注意的是,以民间文献研究农村社会经济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主要资料是作者搜集的民间契约文书,研究风格、包括资料的搜集利用均与传统的治史方式大相径庭,开一代风气,对此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术史、政治史等方面,继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钱穆也出版有同名专著,详细考述明末清初至晚清时期各家的学术脉络与成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随后,徐世昌主撰的《清儒学案》(1938年徐氏刊印)也予以刊布。其他如清代的内阁制度、明末农民起义、家族史研究等,也有专著出版<sup>②</sup>。

与一二十年清史研究的重点在清朝前期不同,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大革命失败,中国的未来出路摆在世人面前,欲了解当时的中国与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要研究此前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性质,于是晚清史研究受到重视,并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研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历史的专著。较早的如李鼎声《中国近代史》,该书《绪论》指出:“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sup>③</sup>《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也指出,“中国过去三千多年的社会是封建社会……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sup>④</sup>该文对此后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明清史研究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以鸦片战

① 萧一山从伦敦查阅的资料,辑为《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计10册,由国立编译局于1936年出版。据该书朱希祖序,此前已有其他人从海外获得的太平天国史料数种出版。

② 萨师炯:《清代内阁制度》,商务印书馆,1946年;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③ 该书《编辑凡例》作于1933年,此据光明书局1949年版。

④ 解放社出版,1944年单行本,第6页。另外,其他文章如《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也批评党内,“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毛泽东选集》第6卷,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1947年,第33页)

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论证该时期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学术著作之中<sup>①</sup>。1940年胡绳发表《论鸦片战争》一文,副标题即为“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则直接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及中国人民旧式的反抗运动”作为标题<sup>②</sup>。

这一时期,随着唯物辩证法逐渐应用于清史研究<sup>③</sup>,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反映于清史论著之中,加之当时社会政治与清史研究的紧密联系,一些研究者对清朝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关怀,使得清史研究中的碰撞与交锋更趋多样与激烈。

例如,在金兆丰的《清史大纲》一书中,天子臣属的等级观念仍有体现,除太平天国外,对其他反清运动辄有贬抑,称农民起义者是作乱,清政府的镇压则为“勘乱”,甚至写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也说“据以为窟穴”<sup>④</sup>。这种封建史观正是民族革命史观者所批判的(如前文所述,萧一山称郑成功为“民族革命之倡导者”),但有些论著对清朝的批判往往矫枉过正、走向了极端的另一面,带有诋毁清朝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正是孟森批评纠正的核心所在。而面对唯物论在清史研究中的逐渐运用,也有人明确表示反对,简又文在《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中写到:“一般地言之,马克斯的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史观,实为不健全的学理,尤其不能施用于太平天国史之解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5页)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将太平天国定性为“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并对“回民暴动”等加以肯定(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而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则明确指出战争对百姓生活的负面影响,批评太平天国是“文化之摧残”,对捻军、苗族与回民反清亦有微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指出:“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社会革命则甚消极。”肯定曾国藩,进而对当政者亦有美言(商务印书馆,1939年)。而范文澜则称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他的《中国近代史》称太平天国是“人民的反封建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sup>⑤</sup>。

大致言之,三四十年的研究成绩与特色有:

1. 史料特别是清宫档案资料的抢救整理取得了初步成绩,以档案为“废纸”的历史一去不返,大量的故宫档案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地整理、刊行。原始档案开始成为清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2. 一二十年代的通论性清史专著为各种学术论文与专题研究所代替(个别的几部清史著作,如孟森的《清史讲义》、萧一山的《清代史》也都是建立在作者多年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清史研究有了更扎实的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又有专题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除前述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外,其他如孟森的《清史传目通检》、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主编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王重民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等等<sup>⑥</sup>。

3. 一些有关清朝的附会传闻虽未杜绝,但经孟森等人的考释订正,以附会传说而为信史的做法在清史学界逐步地得以纠正。另外,虽然在清朝的定位问题上存在不同倾向,但从发展趋势而言,总体上则趋于客观。

4. 唯物史观逐步应用于清史研究,不同史观与不同观点在清史研究中展开争鸣。学术界在继续关注清朝前期的历史之外,一些研究者将重点放在了清朝后期。

不过,此前注重政治军事而弱于社会经济等缺陷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而且还出现了新的不足。主要是:此前的研究者一般把清史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研究,但随着对列强侵华以来历史的关注,晚清史即后来的近代史部分开始从清史中逐渐独立出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近代史是否应该独立,或者因为清史研

① 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世”、“近代”历史的开端,在清末与清亡不久的历史论著中已经出现,至三四十年代,这一划分则进一步增多。如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自序》中说,“近人讲述中国近代史者大都从鸦片战争讲起”(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而且更多地演变为社会性质概念。关于中国“近代”、“近世”的开端(例如是明末清初还是鸦片战争等),当时已存在不少争议。

② 胡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原文发表在重庆《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此据《胡绳全书》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有多种版本,此据三联书店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

③ 虽然此前也有此类学术专著,如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此据1930年昆仑书店第3版)、朱新繁《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上集(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但三四十年代则明显增多。

④ 金兆丰:《清史大纲》,开明书店,1935年,第223页,并参阅第7章第4节、第10章第3节。

⑤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中国近代史》,第83、158—159页。

⑥ 孟森《清史传目通检》,连载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2、3号(分别见第67—110、67—124页),1932年;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王重民《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5年。

究而抹杀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而是部分清史研究者不自觉地逐渐放弃、忽视了对晚清史从清代史整体这一视角开展研究,这一现象虽在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但三四十年代已见端倪。而晚清之前部分则注重于若干具体问题与史实考订,弱于进行整体性与规律性分析,史实考证颇有成绩而理论分析不足,唯物史观在当时还不是主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某些清史研究与当时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总而言之,1949年之前的清史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础。虽然存在着这样与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从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而言,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些学者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与精湛的学术造诣,留下了至今仍受推崇的传世佳作,开一代风气;若干鸿篇巨著与资料整理,亦成为后来清史研究的基本参考与依据。此后的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很大成绩,实与此前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

## (二) 50—70 年代的清史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当时复杂、严峻的国内与国际形势,强调阶级斗争、区分意识形态、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统一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五六十年代的清史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提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峰”,充分肯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由于新中国的建立被视作以先进思想武装的新式农民战争的胜利,所以对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也格外重视,由此也带动了大批学者从事历史上农民起义研究。在此前的近半个世纪里,除太平天国之外,不少清史著作依然将其他绝大多数农民暴动视为内乱,清朝的镇压则是勘乱之举,至此,这些暴动则逐渐被看作是正义的、带有革命性质的农民战争与农民运动。除了对晚清的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与史料刊布外,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等均受到重视,而且将清代农民起义放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历史长河中去分析<sup>①</sup>。

在该时期大陆的学术研究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时代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则问题意识也不同。例如,在此前的清史研究中,前清史一直作为研究重点,侧重点在历史事实如何被清王朝所掩盖、隐瞒与扭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之上,但这时学术界关注的则是清代历史的演变规律,具体地讲,即满族社会形态的演变问题,并与经典作家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论述相回应。满族入主中国,建立了一个封建政权,此无疑义。但在此之前,女真三部的社会性质如何?他们是如何由原始社会演变而来的?是否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制是在何时确立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是否有别于人类社会的一般演变规律而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这一系列问题成为讨论与研究的重点。虽然讨论中也存在分歧,但这种分歧不仅在于史实的认定,更在于结合相关理论的论证分析。

而对晚清部分的研究,则关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其中“两个过程”、“三次高潮”被作为这一时期历史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成为大多数论著普遍采纳的观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横排版,第602页)这两个过程被作为理解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整个晚清在内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三次高潮”由胡绳1954年具体提出,他认为,此前的相关著作,无论是以朝代兴衰还是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期,都没有反映出社会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拆散了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造成“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政治史比重极大,社会、经济和文化分量很小。他主张“基本上以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并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划分为7个阶段,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说,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出现”了第二次高涨,第三次高涨可归结为辛亥革命,是从“义和团失败后的五年”开始的。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最后特别补充,“历史的分期并不等于历史教科书中的分章分节。因此这里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建议,并不是主张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必须这样地分成若干章”<sup>②</sup>。因此他只是提出个人的“建议”而已,而且批评此前著作重政治史而轻社会经济与文化史,提倡透过历史的表象而抓住问题的实质,加强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应该说这些认识都是相当深刻的。不过,若以“阶级斗争的表现”来论说“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反而会使政治史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此后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① 后者如赵儒生《试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的加重》(《文史哲》1955年第9期)。

② 胡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该文引发了分期问题讨论,请参考《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约两年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1956年),已明确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三次“高潮”。1956年7月17日,严中平在《人民日报》撰写《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一文,依然指出经济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这一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重视阶级斗争与革命高潮、经济史分量偏小等特点,在60年代出版的另外两部颇具影响的中国通史中继续得到体现。这种事实也反映出此前多样的晚清史、近代史体系,在这一时期正逐渐地趋于统一,而经济史薄弱的局面并未改变,所以直到80年代初,刘大年依然呼吁应从经济史进行突破、深化研究<sup>①</sup>。

该时期也重视中外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出版了系列列强侵华史的专著<sup>②</sup>,帝国主义侵华史几乎成为中外关系史的代名词。不过,与对美国等侵华列强的抨击、声讨形成鲜明对比,因与前苏联的友好关系,对清朝与沙俄的关系则回避不友善的一面,甚至对原始文献的断章取义,例如,《鸦片战争》资料选录有《国朝先正事略》中的《林文忠公事略》,原本本来有林则徐提醒后进们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告诫,但在编选时却有意将其删略了。又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英之间的战争,但这一时期的资料与论文却较多地抨击美国政府及其贩卖鸦片活动,这显然与当时的中美关系有密切关系。诸如此类反映了国际政治环境对当时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明显影响<sup>③</sup>。

在重点研究清代上层建筑的同时,这一时期也探讨了清代前中期的经济形态问题,后者主要是由“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而展开的,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50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由邓拓1955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直接推动的。在50年代中期之后的讨论文章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一段论述(见下文)也被频繁引用。其实,资本主义萌芽早在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论著中已经论及,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更是发表于30年代末。即使到了50年代初,在邓拓该文之前已有其他学术论著讨论《红楼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为何偏偏该文可以掀起研究的热潮?这还要从新版《毛泽东选集》与邓拓的个人经历谈起。

50年代初,新版的《毛泽东选集》开始陆续出版发行,根据“本书出版的说明”,以前的毛泽东著作“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而这次“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因此,此版无疑更具完整性与权威性。继第1卷面世后,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该卷收录有经更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中包括后来学术界频繁引用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对照此前出版的该文原文,无论是40年代解放出版社的该文本行本,还是晋察冀日报社、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同一部分、同一文章中却没有上述这段论述<sup>④</sup>。因此,要么这一重要的论述为此前出版的著作(或某些著作)所遗漏,要么就是新版中“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这段论述都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邓拓早年接受过几个专业的高等教育,先在上海学习政法、经济,后赴河南学习历史,他在30年代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一文中,已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有“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萌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其自体内所孕育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30年代后期进入晋察冀边区以后,他一直担任党的宣传及其领导工作,1944年,在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被视作中国第一部“毛选”,此后至1955年,他又相继担任过华北局政治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等职务。因此,无论是从邓拓早年的受教育经历还是研究兴趣、学术观点,无论是其参加革命之后的工作性质还是直接主持过《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他都比一般人更有理由、更有机会认识到新版《毛泽东选集》中这段论述的分量与意义。

① 参考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

② 参见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2卷(三联书店,1952、1956年),胡滨《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三联书店,1957年),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③ 曾业英等主编《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0页。海外学者在50年代曾指出了上述缺陷。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竖排版,第596页;前揭解放社单行本,第6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1947年,第62页。

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他说《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在引录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上述论断后又指出，“我们分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间的历史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论文中，新版《毛泽东选集》中的上述重要论断是否为邓拓此文首次引用，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从学术界精心编选的几部资本主义萌芽论文集（及其所附论文索引与综述）中寻找分析，至少是最早者之一<sup>①</sup>。

在当时的讨论中，虽然有的学者力图区分具体研究、学术讨论与历史哲学、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既坚持学以致用，又重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但不可否认，一些学术论文往往落脚于证明经典论述的正确性、回应当时的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例如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有关论点提出批评时，不是论从史出，而是以某些此前结论否定后来的具体研究。尚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很高，认为至明代中期之后已进入“原始积累”时期，这一观点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与商榷，作为学术问题，本应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某些文章则将这一讨论与政治斗争、思想改造联系起来。

五六十年代的特点与成绩是：

1. 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注意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如前所述，在前一时期这一方法已逐渐地应用于清史研究，至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作为研究的指南。1944年侯外庐在其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这亦是正统学者应守的治学精神。”约10年后，他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自序》中则说：“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sup>②</sup>学术界力图总结清朝历史的发展规律、与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相呼应，与前一阶段相比，纯粹考证的研究有所减少。

2. 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要性与研究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研究者、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在中国通史、专题史研究中，清史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独特地位，尽管这一时期通论性清史著作罕见<sup>③</sup>，但大量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其数量是空前的。清史学界也展开诸如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人物评价等专题讨论，在清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民族关系与思想学术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另外，新的体例得到广泛应用，章节体成为专题清史著作的基本体裁形式。

3. 清代的历史资料得到进一步整理与出版。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如《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洋务运动》。“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sup>④</sup>。其他大量的私人文集（如“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农民起义史料等也陆续出版<sup>⑤</sup>。

① 《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后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第69—90页），此处引文分别见第70、72页。其他请参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及其论文集，请参本文其他部分。

② 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作于1944年元旦，三友书店，1944年；《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自序》作于1955年11月24日，该书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

③ 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另外，郑天挺1962年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稿，后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名为《清史简述》。

④ 《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上海神州国光社分别于1951、1952、1953、1953、1953、1954年出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分别于1955、1956年出版；《辛亥革命》、《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7、1961年出版；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年），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⑤ 前者如法式善《陶庐杂录》（中华书局，1959年），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后者如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一些不足、时代特征是：从总体而言，清史研究事实上被割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人的研究只集中清朝前中期，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史；另一些人则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而且大多是从中国近代史体系进行诠释，革命史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前通常意义上的完整清史在这一时期却变成了清朝前中期的历史，这已不是部分人的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sup>①</sup>。诚如前文所说，反对割裂清史并不是反对把清史的某一时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研究，从这一点而言，“中国近代史”的单列与划分无可非议；但是倘若囿于鸦片战争而将清史局限于1840年以前的历史，则无疑从整体上影响了清史研究。

其次，学术研究受到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之争的明显影响。某些研究流于简单化，如人物研究中分清敌我，将其分为正、反面人物；思想观点要突出立场，将其分为唯物、唯心主义；许多研究领域尚无人问津或不能涉足，阶级与阶级斗争成为大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一些研究不是论从史出，而是以若干史实填充经典论述，某些学术商榷实类似于思想改造。

但是，本文更愿意将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不足看作是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在今天看来，当时对农民战争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对其作用的极度拔高存在着不切实际、言过其实的一面，但仔细回味，当年也正是通过这一问题的讨论，数千年来不受重视、社会地位低下的芸芸众生从而成为历史主角，同时也带动了相关的其他问题研究。再如“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虽然在资料取舍与理论运用方面存在不足，某些学术论文中也出现了过激与政治性的语言，但这一讨论发掘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史资料，也体现了当时学人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所付出的努力。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重视政治史的情况下，以此讨论为契机而展开社会经济史的大量实证研究，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研究得到明显加强。不可否认，这一研究对80年代以来诸如商品经济、市场等专题研究起到了具体的铺垫作用。当然也应该承认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研究走了弯路。

在“文革”前，随着学术研究与阶级斗争联系的日益加强，最终出现了学术问题的政治化、清史研究成为某些人政治批判的借口与工具。“文革”期间，历史研究几乎完全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清史研究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不过在与前苏联的关系恶化后，沙俄侵华史受到重视，“文革”期间及结束后一两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sup>②</sup>。另外，也有一些清史资料整理刊布，如《清史稿》即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这部大型的清史参考书步入了普通百姓之家，研究利用更为方便。在当时的艰难岁月里，一些学者进行着清史研究的思考，或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研究，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年内就有不少清史成果问世，这一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

### （三）80年代之后的清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深化，学术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投入到新时期的清史研究之中：继续完成因“文革”干扰而停顿的研究工作（如资本主义萌芽），纠正极左思潮时期的错误认识与教条化做法，如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虽然在整体上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错误，并且从科学的要求来说，对于正确的结论也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出现了某些偏向和错误，加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sup>③</sup>对清史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开拓清史研究的新领域、新局面。

1. 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边疆史的复兴、深化与拓展。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较长的学术渊源，代表人物是傅衣凌，40年代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及其他学术论文，已经体现出这一研究风格。五六十年代他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汇集出版了几本颇具影响的研究专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已趋成熟<sup>④</sup>。80年代，在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国家的重视、学

① 郑天挺1962年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讲到：“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〇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〇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〇年。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不谈了。”（《清史简述》，第1—2页）我们注意到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对清史的时期界定与此不同。

② 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③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作于1981年3月，收入胡绳《历史与现实》，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第34页。

④ 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

术交流的增多以及研究生培养,这一研究风格日益具有影响力。“六五”、“七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中就选取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研究重点,并有阶段性成果问世。1987年,“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召开,显示了这一研究的强大阵容及广泛的影响力,会后由中华书局汇集出版了论文选集<sup>①</sup>。近年来,这一研究群体主要选择了东南沿海、江南等地进行研究,而且注意吸收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注重田野考察、亲身感受与民间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利用,往往选题微小而论证深刻,注意各种因素的横向联系与纵向变迁,其学术旨趣在于回应或重构宏观的、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所以有利于学术对话,备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目前,这一研究风格逐渐为更多的学人所接受,研究区域进一步向内陆以至西部延伸,研究内容则多偏重于社会史、民间文化史。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部分学者因为未能真正领会或把握这一研究风格的学术旨趣,所以往往就事论事或纠缠于极细小的具体问题,从而将区域史研究等同于地方史。

第二类是就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进行总体性考察与分析。这一研究也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著作,而80年代的倡导者主要是此前研究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一批学者,他们积极地展开各类社会史资料的汇集特别是通论性社会史著作的重建,而近10余年来成长起来的一批研究者已普遍注意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视野,西方史学流派及其研究体系(如“年鉴学派”)对其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近年来,这一研究群体也逐渐将选题放在某一阶层与某一区域(如华北)<sup>②</sup>。

第三类的主流是专题社会史研究,其地域范围往往视论题而定。其中秘密会社史的探讨从清末一直延续到现在,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如前所述,在三四十年代,就搜集整理了一批海内外珍贵文献,并就天地会的起源等问题展开讨论。五六十年代,这一讨论又与明清易代史、农民战争史研究相结合。80年代以来,除原有问题展开新的争论外(如天地会起源),并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分析会党的形成与发展,注重档案资料、秘密会社内部文献的发掘与利用,研究议题已扩大到各种秘密会社组织的形成、内部结构及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已就某些专题展开田野考察。

以上仅就研究的主要风格作了扼要说明,并不意味着某研究者的研究一定是属于某一类而排斥其他,作为个人而言,其研究不仅可以兼容并蓄,而且前后也会发生变化,同时也并不否认还有其他风格。从以上的分析中也不难看出,各种学术流派日益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趋势,也正是人们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需要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社会史研究才多姿多彩,才有今天的成就。但也必须指出,目前一些名曰社会史的著作,实际上很多是对社会变态的勾述,由于此类作品比较适合社会上某些人的口味,所以出版量与销量均超过了严肃的学术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史研究与学习者对社会史的理解。这里并不是反对选取这种非常态的问题进行研究,更不是反对通俗读物,而是主张必须端正态度,重视研究目的,我们完全可以从推动学术研究出发、从这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来分析正常的社会结构及运行机制。

在80年代,经济史研究出现热潮,除了上述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风格之外,也出现了对经济学的回归。实际上这种风格也可以追溯至三四十年代,当时一批学者已利用经济学、侧重于统计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当代这批学者一般具有经济学的理论素养与功底,选择了诸如国内市场、商品贸易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粮价、物价指数以至国际收支等等论题,而且日益出现了对现代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应用,选题逐渐向晚清以来的历史阶段延伸。这一风格对纠正经济史研究中注重定性而忽视定量等缺陷大有裨益,也使得大量的史料有了用武之地,不少论点也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不过一些研究者也指出,新的研究方法应大力提倡,但这一方法也有其

①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②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赵云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旭麓也曾较早地倡导社会史研究,其遗著《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已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研究。

局限性,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千姿百态的统计数字,在选择应用时,应慎之又慎<sup>①</sup>。

文化史在80年代中后期也成为热点,1984、1993年,《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继创刊,明末清初三思想家、清代的文化政策、文化成就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增多,而且分析视角与结论都出现了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此前若干时期只谈中西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批判西方对中国消极影响的一种纠正。当然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或搞平均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估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中西关系及其主流,恐怕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另外民间文化史研究异军突起,并出现了与社会史、宗教史、民俗史等学科的交叉与渗透<sup>②</sup>。

边疆史本来是20世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课题,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机构的建立、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刊、大型课题的设立,清代边疆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主办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其中清史论文占主要部分,该中心还组织出版了系列研究丛书与研究资料。在“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就包括有边疆开发史课题。与以前边疆研究的主要背景是捍卫领土主权不同,现在研究又多了一项边疆的开发。另外,由于这些地方又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些研究者也恰恰具有民族史的研究经历,所以当代的边疆史研究也出现了与民族史日益结合的趋势<sup>③</sup>。

## 2. 创办学术刊物、壮大学术队伍、举办学术会议、增进学术交流。

一系列学术刊物的创办,使得清史研究有了自己专门的学术阵地,大量的清史论文源源不断地向外刊布,这类刊物以北京居多: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的《清史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同年,《清史研究通讯》杂志创刊(后来更名为《清史研究》);次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清史研究集》第1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各辑相继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陆续出版)。除这些清史专业刊物外,1979年,《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复刊、创刊,1981年,《历史档案》杂志创刊,成为文博档案系统刊发清史论文、史料的主要刊物。此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相继于1986、1991年创刊,发表了不少清代经济与边疆史地的专题论文。至20世纪末,一些相关的学术刊物还在创办之中,如1999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主办的《明清论丛》第1辑。在北京之外,各地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如学报等)也发表了不少清史研究论文,其中厦门大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吉林大学的《史学集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社会科学战线》、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辑刊》等,清史论文也占有相当比例。

学术团体与学术会议。北京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清史研究颇具实力。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等;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也有一批清史研究专家。其他各地的清史研究也实力不凡并各具特色。如东北清史研究群体在前清史、清代政治史与民族史方面,闽粤学术群体在清代经济史、社会史、民间文化史方面,天津学术群体在清代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方面,长江中下游群体在清代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近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颇有成绩,从而使清史研究后继有人。在学术会议方面,自80年代初第一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在北戴河召开后,至2000年已连续举办过9届全国与国际性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其他学术团体举办的清史专题讨论会则更多。其中的一些学术讨论会与学术团体也以清史的研究讨论为主。例如,1980年郑天挺发起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1991年第2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会后

①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章有义《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2期各位学者的研究笔谈,如陈振汉《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等。

② 参见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炳文等《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林仁川、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并参本文专题综述部分。

③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云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马大正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均出版有论文选集,清史论文占有相当比例<sup>①</sup>。1986年成立的中国经济史学会,199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史学会,其中的不少学者是研究清代的经济、社会史。

除了国内外的各种学术会议、讲学、访问、学习研究外,对海外学术著作的译解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及时。1980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创刊,成为国内同行了解国外研究的专业刊物。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被相继翻译过来,如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次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些出版社推出了系列丛书,大大推动了翻译进程。以前常见的资产阶级作品要揭露批判之类的提示消失了,代之以如何借鉴、取长补短,如《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在《编辑说明》中说“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但优劣得失“相信读者自能鉴别”,“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发展、提高我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途径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不仅翻译在方法论方面具有启迪意义的著作,而且也翻译西方的中国史专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序中说“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些最新译著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因脱销而再版,而先前的一些译著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也重新出版,例如,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50年代即被翻译出版,至2000年,上海书店几经周折将其再版。在译著的出版进度方面,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于1959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最早译本,已是30年后的1989年;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最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最早译本已是20年后的1990年。尽管这主要是由于中美学术界长期的隔阂所造成,但在二三十年之后才能面对对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终究是令人遗憾不已的事情。80年代国外出版的一些新著则与此不同,如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次年中华书局的中文本就已问世。随着国际图书交流的加速与增多、具有外语特长的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长,海外论著的译介速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不过随着译著、刊物的大量增加,一些现象也不容忽视。一些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现在的译作有一哄而上、不加取舍的倾向;随着刊物增多,每年有大量的清史论文发表,但有的刊物与论文质量令人担忧。

3. 清史成果多种多样,大量出版。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而割裂清史的做法正在逐步地得到纠正,包括整个有清一代的大型清史撰述逐步地付诸实施。

80年代初,通论性的清史著作率先出版。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相继于1980、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的《清史简编》上编,也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出版。此后,198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天挺主编的《清史》上编。1991年至1993年间,辽宁人民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一些大型通史的清代部分也相继问世,如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编写组主编的《中国史稿》、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等。这些著作注意吸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由一批清史专家集体完成,有些是作为“六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的结题成果。这一系列清史成果的出版,使50年代以来通论性清史缺乏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也是世纪之交对清史研究的一次总结。

其他大型的清史著作也相继出版。在编年体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编的《清史编年》,自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后,至2000年已全部出齐12卷。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计22册300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同年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计4册,也由岳麓书社出版。又如在人物传记方面,“六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清代人物传稿》,分上下两编、多卷本,80年代中期以来分别由中华书局与辽宁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一些出版社也推出了清史研究系列丛书,如戴逸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由辽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除了这种集体完成的大型、或系列著作外,也有个人完成的扛鼎之作,如杨向奎的多卷本《清儒学案新编》,兼顾了学术思想史及学术史料的双重作用,1985年以来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

限于篇幅与能力,以上仅就近20年来的清史出版物略举其例,其他各类著作特别是数量繁多的专题史论著无法一一提及,但谁都不能否认,后者恰是推动清史深化的强大动力,是大型通论性清史的基础。总之,20年来的清史论著数量是空前的,它反映了清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不过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某些作品在质量方面,还难尽人意。

<sup>①</sup>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在学术界对清史研究进行反思的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 不少学者认为, 不应以鸦片战争而割裂清史, 呼吁并逐步地将整个清代史的撰述付诸实施。

如《清史研究集》“编者的话”中讲到: “清史研究的范围, 当然应该包括清封建王朝自建立以迄复(覆)亡的全部历史过程。因此《清史研究集》将刊登鸦片战争以前、也刊登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论著。”强调清史是整个有清一代的历史。在本辑收录的《对研究清史的一点意见》一文中, 作者李侃指出: “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性质, 把清朝的历史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部分, 这当然是应该的和正确的。但是却不能因此就把清史一刀两断。”其他如王钟翰等人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呼吁研究有清一代的历史<sup>①</sup>。郑天挺主编的《清史》, 在《绪论》中也强调“要研究清代的全史”, “为了加深和丰富对于封建王朝兴衰规律的认识和了解, 也有必要把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去进行研究”, “本书是一部上起清代先世, 下至辛亥革命前, 包括整个有清一代的历史”<sup>②</sup>。由王戎笙主编、作为“六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清代全史》, 率先将有清一代的历史撰述付诸实施, 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另外, 继《清史稿》之后, 一项巨大的清史工程也在酝酿之中。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起草《〈清史〉编纂规划草案》, 1982年交北戴河全国清史会议讨论修改, 80年代初一些学者如戴逸等倡议再修清史<sup>③</sup>。近年来, 这种呼声再起, 举办学术会议, 进行讨论, 并最终获准实施。

#### 4. 资料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清史研究的资料利用更加广阔与方便。

这一时期的清史资料出版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中央档案方面, 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整理出版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选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1978年以来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发行; 影印《清实录》(计60册), 中华书局1985年至1987年陆续出版;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992年出版; 《光绪朝朱批奏折》(计120辑), 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等等。地方出版社也加入到这一行列, 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继《乾隆朝上谕档》之后, 又出版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计55册)、《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计24册)、《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计37册)、《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计10册)、《乾隆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计46册)等大量档案资料, 分别于2000、1998、1996、1999、2000年出版。

继此前《四库全书》由台湾影印出版后, 大陆组织出版了《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及《四库禁毁书丛刊》, 最大限度地补充、搜集了清代《四库全书》编纂时因各种原因而未录、禁毁之书。此类书籍的出版, 必将大大促进清代及此前中国历史的研究。

地方与民间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山东曲阜文管会编选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3编为清代档案史料, 从1980年以来相继出版。其他如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选的《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等。80年代以来, 碑刻资料、契约文书的大量出版也引人注目, 如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 1980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自贡市档案馆等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郑振满与丁荷生编《福建宗墓碑铭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年)、王国平与唐力行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等等; 契约文书, 如杨国桢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1990年增刊)、张传玺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谭棣华与沈剑民编《广东土地契约文书》(含海南)(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与民国编, 计有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但未署具体出版年月, 其中《前言》作于1991年)等等。特别是徽州文书, 内容门类丰富, 前后延续时间长、数量多, 一些案例可作为前后系统分析的依据, 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专题史资料。这类资料数量庞大, 如,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与档案系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史料》(中华书局, 1979年)与《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 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年至1988年), 张侠、杨志本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集》第1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年。不过《简明清史》仍然只写到鸦片战争之前。王钟翰等:《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② 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年。不过该上编还是止于鸦片战争之前。

③ 参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

1982年)。值得说明的是,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建议,继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80年代中期以来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与此前相比,调整了专题设置(如增加了《清末教案》、《立宪运动》等),某些原有专题的资料得到了大大扩充(如《中日战争》等)。此外,其他门类的相关资料,也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之中的《清代笔记小说》(计50册,周光培编,1996年)、《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总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编的清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94年)。

另外,一些史料也重新再版。值得注意的是史料分类发生了微妙变化,例如50年代出版大量私人笔记时,还是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两部分,当再版时,《重印说明》将此前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改为“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出版(中华书局,1997年)。这也许从侧面反映了整体清史研究思路对史料划分的潜在影响。

随着大量资料的出版,各级档案馆的开放,照相、复印、扫描技术以及网上资源的利用,不少学者深入民间收集资料等等,尽管查阅资料中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但与此前相比,清史研究的资料利用无疑是更加丰富与方便。

总之,清史各个专题研究在此前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对一些问题的评价更为公允与客观。以下,谨从政治(含民族与中外关系等)、经济、社会思想与文化等方面作一简略回顾,显然,这一划分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而非建立在严格的逻辑概念与目录分类之上。

## 二 主要研究领域与学术成果

### (一) 政治、民族与中外关系

**清入关前的称谓与社会性质** 关于“满洲”的来历与满族社会性质的演变,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清朝自认为满洲是满族在入关前所建立的国号,得名与佛教有关,日本人等认为是地名,后来经学者们研究,认为满洲是族称而非国号。但满洲的来历、本意是什么,仍有不同意见。孟森认为原作“满住”,“系最大酋长之称”。谢国桢认为与佛教相关,说“满珠”、“满柱”“与佛氏曼殊之音相合,展转而成者也”。郑天挺认为是“部族”之称,批判地名、国名说,“洲字本训水中居地,与原野迥殊,不曰满州而曰满洲,实避土地之名”,“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王钟翰认为,满洲由“诸申”而来,诸申与女真同音,原本是指部分女真人,是族称,为避免汉人对女真人的反感而将这一族称改为满洲。也有人持“曼遮”、“满住”之说,并认为其含义是“神箭手”、“英明”,或对上述说法进一步论证。至于“后金”之称,蔡美彪指出,这一称谓并非来自后人的追称,明朝时就已存在,是由朝鲜传入的,但“后金”亦非大清之前的正式国号,此前应是“金国”或“大金”<sup>①</sup>。

关于满族社会性质的演变,满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是争论的焦点。一种意见认为,满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而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但进入封建社会之前的发展阶段则有不同认识,如尚钺认为,在后金政权建立后,由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莫东寅认为,在明万历年间“从原始公社制的末期,急速转入先封建社会”,努尔哈赤时期尚处于“家长奴役制阶段”。另一种观点,也是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满族从原始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而发展到封建社会,并不存在跳跃奴隶社会这一特殊性,其社会形态演变与其他大多数民族并无二致。在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问题上,除上述后金政权建立说之外,大致还有以下不同观点:李洵认为,建州女真在十五六世纪已进入前期封建制,至入关前的200年间,从前期封建制向发达封建制过渡。阎崇年认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满族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郑天挺认为,后金政权建立时还处在奴隶制阶段,从努尔哈赤晚期至皇太极时期才向封建制过渡。王钟翰认为,以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实行“计口授田”为标志,满族开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至皇太极时期,封建制才最终确立。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

<sup>①</sup> 参见孟森《清朝前纪》(第3页),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叙论》(第11页下一12页上),郑天挺《清史探微》(第4页),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滕绍箴《试谈“满洲”一辞的源流》(《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3期),王文郁《“满洲”族称的由来》(《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孙文良《论满族的崛起》(《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同与进一步论证<sup>①</sup>。

清兵入关及入关后的战争性质 争论的焦点是：清兵入关是否是其既定政策、吴三桂是否降清、山海关之战胜负的原因是什么、清军入关后的战争性质到底是什么等几个相关联的问题。一种意见否定清军入关是既定政策，否定其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关文发认为，清军入关时并没有统一全国的战略，入关战争是满汉地主联合镇压农民军的阶级斗争，后来又转为民族战争，但不是统一战争。陈梧桐指出，肯定清兵入关及其进行的战争为统一战争的观点，是无视清朝的残暴统治与民族压迫，否定广大汉族等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王思治等人认为清军入关后的战争是带有民族战争色彩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也有人认为，清朝入关前后所进行的战争是掠夺战争，随着战争的逐步胜利，注意采取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军入关是其既定的南下政策，但在与吴三桂降清的关系方面却有不同看法。陈生玺认为清兵入关是其南下政策的继续，吴三桂降清也给清兵入关提供了条件。李治亭认为，清军入关是皇太极定下的基本国策，与吴三桂迎降并无必然联系，清军入关前即已形成与明朝的对峙局面、具备了取胜的条件。他还强调，不能将清的统一战争误解为民族征服战争<sup>②</sup>。山海关之战是否农民军一定失败及其失败的原因，吴三桂降清与此战胜负之间的关系，清统一全国是必然的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或然性，学术界颇有分歧。商鸿逵对山海关之战进行了详细考析，认为农民军的失败是由于自身的麻痹大意，也与清军参战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人认为清军入关与统一的成功具有偶然性。顾诚指出，不能将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性，他否定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认为清王朝只是其中之一。张正明认为，李自成农民军与满族统治者均有统一全国的可能性，最终只是李自成的失误给清军的胜利提供了机会<sup>③</sup>。另外，与以往所说的吴三桂降清这一传统观点不同，左书谔认为吴三桂自始至终并未降清，从而引发了约两年的持续讨论，其中也存在几种过渡性观点，但最后降清的主张仍占主流地位，问题是如何看待与评价吴三桂降清<sup>④</sup>。

清初的社会矛盾 与对明清之际与清初战争的定性相联系，对清初的社会矛盾，虽然论者基本上都注意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问题，但以何者为主、两者的关系如何却存在不少分歧，大致可以分为：1.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说。刘大年认为清军入关后，地主阶级“反满”与“拥满”之间的战争代替了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许多中小地主构成“拥满派”，若干地主知识分子等则“宣传反满思想”，反满与拥满这一矛盾是从属于并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实质。2. 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与民族矛盾结合说。杨树森认为，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随着民族压迫政策的实施，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反清民族压迫斗争逐渐结合起来。3. 民族矛盾说。商鸿逵认为，清初的主要矛盾并非阶级内部矛盾或阶级矛盾，而是反抗满族贵族统治的民族矛盾。4. 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说。张玉兴认为，清朝确立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统治，当时矛盾的核心是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5. 多种矛盾交织转化说。这种观点主张分阶段地具体分析，反对一概而论。郑天挺认为，清军入关之前，国内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入关之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此后又存在着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的相互转化，不过，民族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顾诚认为，明末和清兵入关初期阶级矛盾是

① 参见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7期），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收入《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均收入《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李洵《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阎崇年《清入关前满洲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287页）。

② 参见关文发《试论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陈梧桐《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王思治、李鸿彬《论明清战争与清代社会矛盾》（《史学集刊》1985年第2期），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2卷《绪论》，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李治亭《明清战争与清初历史发展趋势》（《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南明史辨》（《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

③ 参见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南明史·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张正明《论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晋阳学刊》1986年第3期）。

④ 参见左书谔《吴三桂“降清”考辨》（《北方论丛》1986年第2期），李治亭《历史的回答——也辨吴三桂降清问题》（《北方论丛》1988年第1期）。当时的讨论文章主要刊发在这一时期的《北方论丛》上。

主要矛盾,此后随着推行民族征服与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康熙建立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民族矛盾又退居次要地位<sup>①</sup>。

清代的机构与制度建设 八旗制度、兵制方面。八旗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一文,就八旗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已作了初步考察。学术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满洲八旗,认为该制度受到少数民族早期社会形态的直接影响,与辽、金、元的部族军队与乡兵制存在着沿革关系,是奴隶社会的部族联合组织形式、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针对该制度的创立时间,李鸿彬、郭成康认为,辛丑年即1601年建四旗、甲寅年即1614年建八旗之说均不足为信,乙卯年即1615年,努尔哈赤将所属的所有满族官民及经战争或买卖而来的其他民族人口编入这一组织,随后正式出现四正色旗与四镶色旗,八旗制度最终确立。另外,一些论文重点讨论了八旗制度与皇权集中之间的互动关系。汉军八旗的创立时间,孟森上文认为是天聪7年,现在有人考订应是天聪5年正月。蒙古八旗,王钟翰、达力扎布就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八旗蒙古的创立、规制、特征、数目等进行了深入研究<sup>②</sup>。如前所述,罗尔纲三四十年代即对清代兵制进行了系列研究,其中《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一文,已提出咸丰前、后,清代兵权分别由中央、私人掌握的观点。80年代中期以来,中华书局分别再版了《绿营兵志》与经更名的《湘军兵志》、出版了《晚清兵志》。除八旗、绿营在维护清朝政权中的作用及其消长演化外,清代后期的地方武装如淮军、湘军其他团练等在太平之后逐渐成为对内进行镇压的有效工具,但随之而来的是汉族官员与地方力量的强大,对此后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③</sup>。

军机处的争论也较多,主要集中在设立时间及其作用方面。一种意见认为,军需房是军机处前身,以军需房的设立作为军机处的始设时间,但军需房的设立时间也存在争议,一些人如俞炳坤认为是雍正4年,另一些人认为雍正4年是军需大臣而不是军需房的设立时间,后者当设于雍正七年(如季士家、南炳文)。另一种意见认为,军需房不是军机处的前身,军需房作为户部的附属机构是长期存在的、是与军机处不同性质的机构,两者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军机处的设立时间当以现存军机处档案的开始时间与乾隆上谕的雍正八年为准(如刘子扬、赵志强)。又《清史稿·职官志》记载,军机处是雍正十年设立的,但这一观点现在基本上无人采用。此外,还有人主张对军机处设立的研究应不局限于军事需要之类的偶然因素,而应从国家中枢权力的转移来考察,认为军机处的设立是一个渐进过程,如果要确定时间界标的话,似以赵翼的“雍正年间”说为宜(如郭成康)。至于以往认为军机处的设立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是针对清初内阁与皇权的对立,学术界也提出不同看法。高翔认为,皇权与内阁并不对立,内阁正是服务于皇权扩张的需要,军机处的出现并非针对内阁,而是将皇帝独裁制度化,这一权力结构的变化也逐渐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sup>④</sup>。又如奏折制度。一般认为其大背景是为

① 参见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杨树森《关于清政权入关后战争性质问题的商榷》(《民族团结》1962年第1期),商鸿逵《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张玉兴等《清初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笔谈》(《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郑天挺《清史简述》(第21—24页),顾诚《论清初的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清史论丛》第2辑)。

② 参见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收入孟森《清史讲义》),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卷1《叙论》(第16页上)。陈寅恪等人已指出八旗制度与辽金民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参见李旭《论八旗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郑天挺《牛录·城守官·姓长——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李鸿彬、郭成康《努尔哈赤一六〇一年建旗考辨》、《八旗建立年代考异》(分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徐凯《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姚念慈《多尔衮与皇权政治》(《清史论丛》1996年号),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王钟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收入《清史杂考》),达力扎布《清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③ 罗尔纲一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绿营兵志》与更名的《湘军兵志》(原名《湘军新志》),均由中华书局1984年再版;《晚清兵志》(共计6卷),中华书局从1997年至1999年陆续出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 参见俞炳坤《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历史档案》1991年第3、4期),季士家《浅论清军机处与极权政治》(《清史论丛》第5辑),南炳文《军机处设立时间考辨》(《清史研究集》第4辑),刘子扬《清代的军机处》(《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赵志强《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郭成康《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加强文书的办理与保密性而出台的,争议在其具体创立时间及其传承关系,杨启樵认为可能创始于顺治朝,朱金甫认为,奏折制度出现于康熙二十年代,此前所谓的顺治与康熙朝奏折实为奏本而非奏折,奏折制度至康熙三十年代发展至密折阶段,后来具有密折奏事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sup>①</sup>。关于地方与基层组织与制度,例如清代的督抚制度、道与道员、幕府制度、地方政府的职能与施政特点、里甲与保甲等,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注重考察清政府的运作机制,对一些制度的考察、评价也趋于全面与客观。科举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早期的科举专著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注重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考察,章中如、商衍鎏的著作即是。而且在80年代之前,大陆对科举的评价多强调其负面影响,而海外学者则多有肯定,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公平竞争成分,是维系帝国统治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大陆学术界也在该制度的具体考察与评价方面取得进展,王戎笙指出,前代前期在科举利弊存废之争中某些认识的深刻性并不比晚清逊色,可以与清末洋务派、维新派的议论相媲美。李世愉则对廷试等方面进行了考辨,填补了审音、搜落卷、复试等研究的空白与不足,并考察了某些制度在清代的变迁。宋元强认为该制度具有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的基本特征<sup>③</sup>。与科举制度相联系,则有绅士与捐纳制度研究。清代后期,捐纳之例大开,以金钱等而取得功名地位者不在少数。40年代许大龄即以捐纳为题完成其研究生毕业论文,对其历史渊源、变化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而绅士则是国内外学术较多关注的课题,40年代出版的《皇权与绅权》一书,收入的论文虽非针对清代绅士,但表明了当时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五六十年代,张仲礼在美国相继出版了《中国绅士》与《中国绅士的收入》两部著作,不仅从制度演变、个案分析进行讨论,而且注重量化与分类分析,揭示绅士的功能、演变与影响,大大地推动了对清代绅士的研究。此后不少论著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将其作为分析明清以来社会演变的重要视角,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已出版了一系列该方面的译作与论著<sup>④</sup>。

清代在管理宫廷事务、行政运作等方面也有特色。如,除个别特例外,基本上避免了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宦官专权、内朝外朝之争,郑天挺从“包衣”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清代以包衣内务府来负责宫廷事务,除清初一度曾设有十三衙门以宦官执掌外,宫廷事务全归由流官担任的内务府掌管,从而在制度上限制了宦官操纵政柄,这是清代避免所谓宦官之祸的原因所在。又如皇位继承制度,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往往引发宫廷政变、骨肉残杀,但雍正实行秘密建储后,嫡长子继承制在制度上被最终废止,虽然此后皇位的传承并非尽善尽美,但由于皇位未定而引发的流血冲突不复存在。传统社会血缘地缘关系盘根错节,为了减少、

- ① 参见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以上军机处与奏折制度研究,台湾学者如庄吉发等人贡献良多,其部分观点实在大陆学者之前,有些观点此处尚未提及。
- ② 参见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清代幕府制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朱东安《关于清代的道和道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柏桦《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 ③ 参见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上海黎明书局,1931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关于社会流动方面的考察1368—1911》(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王戎笙《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明清论丛》第1辑),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 ④ 参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学报》专号之22,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此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2001年译本,原作分别初版于1955、1962年),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此据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译本,原作初版于1966年),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另外,日本、韩国学术界对此问题也作了一系列探讨,颇值得参考。

避免由此而来的弊端,清代实行了多方位的人事回避制度,如籍地回避、各种社会关系回避以及特定职务回避等<sup>①</sup>。上述奏折制度也是清朝的特色,它赋予臣属绕过上级而将公私之事及时直达最高统治者,官员活动、各种政务尽在皇权的掌握之中。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制度本身与具体实施效果等同起来,学者们已注意到,即使清代前中期君主集权高度强化,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方对中央决策也产生反弹与影响,官僚也力图摆脱君主控制<sup>②</sup>。

人物研究 该方面一直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文革”之前,人物研究中比较注重其阶级属性、正面与反面以及思想中的唯物与唯心,简单化、机械化现象比较严重。“文革”中,一些人更是利用历史人物进行政治批判、政治斗争。进入80年代后,除人物传记的刊印整理外,有的专著在史实考释等方面颇显功力,有的出版社甚至推出了人物传记系列丛书。另外,一些论著已注意加强薄弱方面——如反面人物、地位较低人物研究,主张根据具体客观情况、历史地评价某些人物的是非功过,既肯定成绩,也不包庇其不足。在帝王研究之外,出现对多尔衮、施琅、和珅等人的专题研究。除了单个人物传记外,也有就乾隆及其时代、康熙三帝的统治思想等等的综合研究。针对近年来对洪承畴等人翻案,张玉兴坚持认为,洪承畴在清朝推行杀戮政策时投降是助纣为虐,批评人物研究中有“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倾向。媒体中的“历史剧”近年来也颇有市场,但在人物定位与一些史实方面存在不少差错,对此方家在不同场合也提出批评<sup>③</sup>。

就众多的人物研究而言,以雍正继位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最为激烈与持久。雍正是夺位还是正常继位,孟森认为康熙曾有意立十四子胤禵,而最终四子胤禛与年羹尧、隆科多等人合谋夺取了皇位。后来,王钟翰发表一系列文章,力主夺嫡说。例如,他指出所谓清圣祖《遗诏》是伪造的,实际是从《面谕》增删而来,认为这是雍正篡位的物证等等。此后,杨珍、许曾重等人,对此说继续予以发挥与论证。但冯尔康等人则主张继位说,认为胤禵为皇储之说并无直接证据。史松认为,康熙令胤禵西征实际是分其党羽,而非委以重任、意欲传位于他。张羽新认为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其父雍正<sup>④</sup>。关于李自成的结局,早先曾有人提出禅隐的可能性,50年代也进行过专门调查考证,大家基本同意李自成被害于湖北省通山县。80年代这一问题又起争论,至90年代则分歧依然,《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继续坚持湖北通山遇害说,否定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而《李自成终归何处》一书则持禅隐说、或主张存在这一可能性<sup>⑤</sup>。

① 参见郑天挺《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收入《清史探微》)。孟森在《八旗制度考实》中说:“清代官禁,制御闾阎较明代为清肃。此亦得力于内务府之有大臣。纵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余私昵,若明之司礼秉笔等太监比也。”(《清史讲义》,第84页)胡建华《略论清朝的皇位继承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韦庆远《论清代人事回避制度》(《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② 参见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③ 史实考订方面,林则徐研究就比较典型,如杨国桢著《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另参见王思治《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4期),李鸿彬《试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1998年),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翔《康熙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玉兴《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秦晖《〈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中国青年报》1999年3月15日),韦庆远《论雍正其人》(《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

④ 参见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王钟翰《清世宗夺嫡考实》、《胤禛西征纪实》(均收《清史杂考》)、《清圣祖遗诏考辨》(《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胤禛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清史论丛》第4辑),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6辑)、《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1992年号),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68页),史松《康熙朝皇位斗争和雍正继位》(《清史研究集》第4辑),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

⑤ 参见《关于大顺军领袖李自成被害地点的考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其中有李文治、湖北师专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金毓麟、郭沫若的意见;以王戎笙为组长的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三秦出版社,1999年)。

当前的人物研究存在着若干不尽人意之处,如帝王贤臣传记过多、内容与评价则出现雷同;一些人物研究为某些功利所驱动,某些争论至少从行文而言已超出了学术商榷的范围。

**民族与边陲** 在清末民初反对满清的大背景下,一二十年代的不少清史著作对清朝的民族政策予以抨击。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伪“满洲国”的建立,以满州贵族为统治核心的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自然不会得到多少肯定。五六十年代,虽然学术界力图正视历史上的民族政策,但在新时期民族大团结的映衬下,人们多关注其中阴暗的一面。不过,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热潮中也加强了少数民族起义及其阶级性与民族性等问题的讨论,历史上加在少数民族身上的诬蔑、鄙视得到根本的扭转与纠正。80年代以来,学术界深入研究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肯定其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有对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总体论述,也有理藩院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有人研究清代的民族立法后认为,清代吸收了前代民族立法成果,又因族制宜,表现出内地化趋势,民族立法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但学术界并不否认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性、满族贵族的优越地位,如有人对世爵世职制度研究后认为,虽然清朝标榜满汉一体、异姓有军功者也被授以世爵世职,但主要是赏给八旗将士及皇亲国戚等,事实上始终存在着重满轻汉现象<sup>①</sup>。

对某些制度政策、民族史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评价更加公允客观。以西南的“改土归流”政策为例,以前多持否定意见,80年代以来,王钟翰、张捷夫等人充分肯定其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巩固多民族国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张捷夫还指出,“改土归流”只是清政府打击土司的措施,而不是废除土司制度,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并未废除土司制度,还设置了许多新土司。李世愉对该制度的起源、形成、雍正“改土归流”的利弊得失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指出,清政府“以汉化夷”在西南实施了多种措施,对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革除陋习等具有积极意义,但基本是以汉族的传统观念为标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sup>②</sup>。

关于西、北地区,除了以前的疆域领土问题外,近年来也加强了民族宗教问题、边疆开发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蒙、藏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发展史等方面的专著,在某些政策措施的评价方面也注意辩证分析。另外对西北地区开发、社会经济变迁等方面也进行细致研究,清代边疆地区与内地联系日益加强,这一事实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此前相比,从事这一领域研究者逐渐增多,并将民族史、宗教问题以及边疆开发相联系,对边疆地区进行总体研究,考察其发展变化轨迹,总结清代边疆治理、开发的利弊得失<sup>③</sup>。海疆方面,韩振华生前对南海主权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绩,部分论文已汇集出版,吴天颖则对甲午战争之前钓鱼列岛的归属进行了详细考辨。海疆政策近年来也受到重视。台湾地区,从疆土统一、民族史研究而扩展到整个台湾史的研究。对香港、澳门史的研究也在两地相继回归前后达到高潮。另外,学术界也对某些概念进行反思。例如何谓分裂政权?这一反思实际上与80年代对“领土”、“疆域”的讨论相联系,以前学术界普遍肯定清朝平定准噶尔分裂政权的战争,但成崇德认为,分裂是指统一的政权变成了几个政权或某一政权脱离原来政权,但与清朝同时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中,某些早于清朝或与清朝同时建立,并不存在分裂清朝问题,准噶尔汗国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强调中华版图之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及其对分裂概念的反思无疑有助于重新审视以前的

- ① 参见王钟翰《试论理藩院与蒙古》(《清史研究集》第3辑)、《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赵云田《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刘广安《简论清代民族立法》(《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晏子友《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号)。
- ② 参见王钟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文史》第10辑),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代土司制度》、《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分载《清史论丛》第2、3、5辑),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③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乌云毕力格等《蒙古民族通史》第4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苏发祥《清代治理西藏政策》(民族出版社,1999年),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张羽新《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某些研究,不过否定准噶尔汗国是分裂政权之说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响应<sup>①</sup>。

中外关系(含经济文化关系) 五六十年代强调中外的政治军事冲突、外国对华的文化渗透与经济侵略,研究领域、评价分析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从整体而言是以批判否定为主。80年代以来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如郑克晟等人在指出传教士与西方对外扩张一致性的同时,肯定其对中国科技文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一些人认为,“西洋奇器”在客观上对中国传统科技发展具有进步意义,只是它们的作用在当时并没有被认识与利用。而何兆武等人通过考察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具体内容,认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的神学体系与中国时势要求相背离,真正推动中国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是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之下的中国学者。对于晚清时期外国传教士的作用,学术界也力图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与根源,中西学者对此也展开新的分析,重视其中的民间传统文化因素及其作用。除中西关系外,也探讨了清代前中期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sup>②</sup>。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虽然并不否认西方的经济侵略及其负面影响,但也出现了肯定中外经济关系的加强及其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积极作用。其他方面的评价分析也更加全面、客观,如此前曾认为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而张振鹄认为,既要看到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一面,也要肯定其与帝国主义矛盾斗争的一面,晚清政府并没有彻底投降帝国主义<sup>③</sup>。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所谓清代的“闭关”“锁国”长期以来是争论的焦点。例如刘大年认为,清朝初期并未闭关,对外通商口岸是开放的,后来这一政策的出台是欧洲殖民势力东侵的结果,康熙以后外国传教士并未带来当时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所以这一政策也就无所谓造成中国科学技术落后问题。而李平心认为,这一政策除了防范殖民主义入侵外,也存在着限制中国人民向沿海与海外发展的一面,它的出台是为了加强清政府的统治,而不完全是防止外国侵略<sup>④</sup>。“文革”后,对该问题的讨论再度掀起,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清朝是否存在闭关锁国、对其如何理解、评价?一种意见认为,清政府以种种措施限制中外贸易,这种消极落后政策既不能阻挡欧美侵略,也不能减轻侵略祸患。有人甚至认为该政策毫无意义可言<sup>⑤</sup>。第二种意见强调清政府在政治文化上对西方的禁绝与抵制,是政治文化方面的闭关自守,在主观上防范西方,在客观上则阻碍了对外来事物、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接触<sup>⑥</sup>。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清政府存在着对外贸易的限制,但在总体上对外贸易是开放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不存在闭关锁国,清代的对外贸易继续扩大,超过了明代,而且起到了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作用。或认为虽不能说是“开放”的,但也不是闭关锁国。部分学者又主张,对其作用与政策演变应

- ① 参见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何瑜《清代新疆政策思想探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陈国强《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康熙时期台湾高山族社会的发展状况》(《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陈在正等《清代台湾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杨建新《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
- ② 参见郑克晟《关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的几个问题》(《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何哲《清代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蒂尔贡、李晟文《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赵世瑜《寺庙宫观与明清中西文化冲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佐哲《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清史论丛》1993年号)。
- ③ 参见严中平、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2000年),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振鹄《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 ④ 参见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李平心《论康熙帝的历史地位》(《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9页)。
- ⑤ 参见戴逸《简明清史》第2册(第515—524页),林祥瑞《关于清朝闭关政策性质的商榷》(《福建论坛》1981年第1期)。
- ⑥ 参见胡思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张之毅《清代闭关自守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作具体分析<sup>①</sup>。中外贸易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亚洲贸易圈研究,其中滨下武志以朝贡贸易为基点,从中国与亚洲内部来分析近代化的因素,如果说柯文主要是从理论上对西方冲击说提出挑战的话,那么这里的研究则更加重视了实证分析<sup>②</sup>。

晚清史上重大事件的分析、考释也取得重要进展。例如所谓《穿鼻草约》,人们曾认为是中英之间签订的条约,据此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实际上此约是英国单方面制定的,琦善并未在草约上签字。以前人们常说鸦片战争中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两大阵营,而道光皇帝摇摆不定,有学者据档案材料分析认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这两大阵营,其实反映的是儒家的剿抚并用政策<sup>③</sup>。又如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的开战时间,此前一般认为是1894年7月25日7时52分济远号发炮,但戚其章研究指出,应是7时45分日舰吉野号发炮、52分济远号发炮还击,这不简单地只是几分钟的问题,而是分辨谁是挑衅者这一大是大非问题,进一步论证了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sup>④</sup>。1949年之前,不少论著称义和团是“拳匪”之乱,五六十年代,大陆学术界纠正了这一诬蔑与否定,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清王朝腐败统治中的积极作用,但却忽视对其落后性的考察。80年代有人重点指出其落后性与负面影响,例如对科技、外国人的排斥与仇杀,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有人反驳说,不能脱离当时的民族危机而独立地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有人指出,既要看到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否定其盲目排外而为之辩护,应根据情况具体分析<sup>⑤</sup>。近一二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对晚清时期的历史研究出现较大调整,革命史的基调逐渐消退,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方面的研究者也相对减少,人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但一些老问题在经过长期的积累与研究之后很有总结必要<sup>⑥</sup>。

## (二) 经济关系诸领域

经济政策 学术界一般在论述清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时,习惯于称道取消“三饷加派”,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但陈支平认为,明末“三饷加派”在清初实际上以新的名目继续存在,蠲免赋税也是无法征收的不得已办法,与明末相比较,清初并未真正做到“轻徭薄赋”。陈锋亦认为,所谓的“轻徭薄赋”政策对社会经济恢复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sup>⑦</sup>。“摊丁入亩”是清代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郭松义从大量文献入手,详细考察了这一制度在各地的实施情况。学术界曾普遍认为,广东于康熙五十五年获准摊丁入地,是全国最早实施该政策的省份,但刘志伟纠正说,广东的摊丁入地是明代嘉万以来的逐渐改革过程,在康熙末年之前实现了丁税向地税的转变,此后至雍正年间各地才逐渐将丁银归入田赋一并承纳;他强调,既要重视课税对象,又要重视税种合并,这样对摊丁入地的过程与意义才会有正确的认识。他还指出,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户”的登记内容由人变为田产数额、由社会实体变为纳税客体,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建立在土地财产、民间社会的从属之上而非对国家的人身隶属之上,从而使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中介的作用更为重要,从而给赋役制度史的

- ① 参见郭蕴静《清代商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9—312页)、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韦庆远《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 ② 参见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③ 参见杨国桢《林则徐传》(第305页)、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酆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 ④ 参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第120页)、《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 ⑤ 参见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朱东安等《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 ⑥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
- ⑦ 参见陈支平《清初地丁钱粮征收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陈锋《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考论》(《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研究赋予了新的意义<sup>①</sup>。关于清前期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人们一般认为其直接原因是额外滥征、贪污挪用以及地方府库空虚等,薛瑞录对该制度进行了系统考察,并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实施时间是雍正元年。而陈东林认为发端于雍正元年、次年通过廷议、完成于雍正十三年<sup>②</sup>。商税方面,清代是恤商还是抑商,商税与商业发展的关系等,学术界也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清代通过官营商业和专卖、榷关、牙行、行会等制度干预国内商业,以行商制度干预对外贸易,从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商税机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sup>③</sup>。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清代商税制度最为健全,其税率与田赋税率大体相同,属于恤商;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对商人采取了积极鼓励与扶持政策,所谓的“抑商”只不过是调整与其他行业的暂时矛盾而已。清前期财政收入中商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商品流通的扩大,而不是商税的增加<sup>④</sup>。关于清代的关税、海关等方面,彭雨新、陈诗启、戴一峰等相继出版了专著,予以详细讨论,深化了清代财政税收制度研究<sup>⑤</sup>。其他如袁良义对清代“一条鞭法”的系统考察,陈锋对清代的军费、财政政策与结构变化的研究,何平对清代赋税政策的分析,朱英对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探讨等,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sup>⑥</sup>。制度史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虽然取得了若干成绩,但与经济史的发展要求还存在相当差距,还有不少研究需要进行,方家已呼吁加强该方面的研究<sup>⑦</sup>。

**土地占有关系与经济运行特点** 土地占有关系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中,有关清代以来的地权是集中还是分散就有激烈的论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至50年代最终完成,而土改的基本原因是认为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加之五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土地高度集中几乎成为当时大陆论著的一致观点。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出现多元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 地主土地所有制。此观点最具代表性。五六十年代,人们大多强调地权高度集中、地主出租经营及其自给自足性。80年代以来出现新的变化,例如章有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以前地权高度集中之说是言过其实,不过他并不否定地主制。李文治将地主制经济分为广狭两种,“狭义的地主制经济指民田地主所有制”,广义的地主制经济则泛指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的“整个土地制度体系”。方行则肯定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加之后来对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使得这种观点与下面其他观点之间的分歧有所缩小<sup>⑧</sup>。2. 至少某些地区以小农经济为主、地权分散,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占优势或微不足道,而且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如关中并非短期存在,强调地权集散的多样性<sup>⑨</sup>。3. 对传统地主制经济的全面否定。代表人物是赵冈。强调商品货币关系、契约法律关

- ① 参见郭松义《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刘志伟《广东摊丁入地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 ② 参见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实施时间考》(《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2期)、《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清史论丛》第5辑),陈东林《试论雍正“耗羡归公养廉”的财政改革》(《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
- ③ 参见萧国亮《清代封建国家干预商业经济的历史特点及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1期),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 ④ 参见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初探》(《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郭蕴静《清代商业史》(第19页),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 ⑤ 参见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 ⑥ 参见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 ⑦ 参见刘志伟、陈春声《理解中国传统“经济”应重视典章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⑧ 参见章有义《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前言》(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李文治《地主经济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纲》(《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再论地主制经济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方行《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此类论述颇多,例如江太新、史志宏、刘克祥、史建云等均有系列成果,此不赘述。
- ⑨ 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系的进步与成熟,否定所谓地主占有并出租土地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等<sup>①</sup>。4. 强调土地所有形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用“乡族”地主概念,认为清代的土地占有既有集中也有分散,两者并行不悖<sup>②</sup>。上述第一种观点普遍强调地权转移中经济力量的加强、特权暴力的减少、宗法关系的松懈。第二、四种观点分别强调权力和非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三种观点则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在经营方式方面,第一种观点集中于租佃制及其各种形式的演变,将雇佣制作为最先进的经营形式,由分成租到定额租、由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由租佃制到雇佣制,是由低级落后向高级先进的过渡与转变。第二、四种观点强调区域差异与经营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农业经营形式的演进与优劣分析重视其具体内涵,租佃制也罢、雇佣制也罢,其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异更加取决于其实质与运行机制<sup>③</sup>。第三种观点是建立在对经典理论与传统观点的学术批判之上,注重大跨度分析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如认为在租佃关系中地主无法选择对他们有利的租佃制,也无法避免永佃制对地权的割裂与冲击等等。相形之下,学术界对第一种的论证最多、也最详细,以下即就该方面略作综述<sup>④</sup>。

租佃关系 就一般民田的分成租与定额租而言,除认为分成租在清代前期仍占统治地位外,一些人根据档案如刑科题本等材料分析认为,清代前期已由分成租发展为定额租,或说乾嘉时期从总体而言定额租已占统治地位,但具体比例则各地之间参差不一。以前人们普遍从生产资料所属关系、佃农经济条件的优劣、年成丰歉、主佃关系等方面分析租额与租佃关系的变化,9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清代前期地租相对稳定、大致维持在均分地租这样一个地租率,另外从生态环境来分析地租形态的变化也颇具说服力<sup>⑤</sup>。官田旗地,一般也认为是定额租为主,分成租次之,实物租向货币地租转化。关于货币地租,认为主要存在于江南与东南沿海,或认为在官田中比较常见<sup>⑥</sup>。学术界一般认为分成租是较定额租、货币地租落后的租佃关系,货币地租是地租的最高级形态,是商品性农业、赋役制度改革、地主消费增加、主佃斗争的结果,货币地租存在于某些地区并不普遍。

几种特殊的租佃形态。押租制是预交地租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出现的基本原因是地主为确保地租收入而采取的经济强制方式,从而影响了佃户的农业投入,加重了经济负担,但从发展趋势分析,它在客观上却可导致永佃制的产生及田底与田面权的分离。当然田底与田面的分离不能单纯从租佃关系来解释,例如分家也是起因之一;同样对永佃制的产生原因也不能仅仅从押租制来分析。一般认为,永佃制产生的基本背景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主佃之间的矛盾斗争。具体而言,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转移方式、开垦中的投入多寡、定额租的实行等对其有直接的影响。田底与田面权的分离是导致二地主或三地主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后者的产生原因也较复杂,其中近年来有人利用产权理论进行的解释颇有新意。人们对永佃权、一田二主的理解

- ① 参见赵冈《地主经济制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农地的零细化》、《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土地租佃》(分载《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2000年第2期);关于其系统论述,请参见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 ② 参见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郑振满《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略论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特征》(《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关雨辰《从〈卖田说〉看清代的土地集中过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 ③ 参见傅衣凌前揭书,陈支平《明清福建货币地租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钞晓鸿《本世纪前期陕西农业雇佣租佃关系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④ 以上观点既有分歧、也有交叉,如王毓铨并未主张地权分散,但强调等级与权力(《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傅筑夫虽不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却强调商品货币关系(《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章有义、刘克祥等也分别指出货币地租、雇佣劳动的复杂性。清代的经济运行机制,也有专门的讨论,刘志伟、陈春声提出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实际是重视从社会文化来分析经济(《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史志宏则强调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不赞成上述的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分析(《关于“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 ⑤ 参见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清史论丛》第2辑)、宋秀元《清代前期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6期)、李文治《明清时代的地租》(《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远廉、谢肇华《清代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方行《清代前期的封建地租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王建华《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 ⑥ 参见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848—888页)、刘永成前揭文、冯尔康《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初探》(《南开史学》1980年第1期)。

也不一致,例如傅衣凌、章有义、杨国桢等虽然指出对佃农经济地位的提升,但更加强调习惯法的作用,将其作为封建地权顽固性、传统社会经济的弹性来理解;而方行、魏金玉、冯尔康等人并非否认中国经济结构的坚固性,但在此问题上更愿意将此理解为农民经济力量的成长与(经济)阶层流动性的表现<sup>①</sup>。另外,对于佃仆制、“分益雇役”制、“把头”制、“伙种”、垦首制等,人们也从租佃关系、雇佣关系来分析<sup>②</sup>。

除租佃关系外,学术界也集中讨论了雇佣关系,不过这一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围绕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而展开的,而且对“萌芽”的研究既不局限于清代、也非只在农业领域。

资本主义萌芽 20 世纪上半叶,邓拓、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论著中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1951 年至 1955 年,王仲荦、傅衣凌、李光壁、张维华等人也发表了相关论文。但自邓拓 1955 年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之后,掀起了第一次讨论的高潮,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初,各种刊物发表了大量的专题讨论文章,并有论著与论文集出版<sup>③</sup>。第二次是在 70 年代末与 80 年代,这是“拨乱反正”之后对前一个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继续,而且讨论更加系统化,例如《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书,即主要是在文革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见仁见智,有些分歧来自于概念差异与论证方法的不同,吴承明指出,资本主义萌芽是生产关系,具有延续性与导向性,它不是一厂一店,不能用举例方法来论证,他任主编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正是从概念的理解与定义入手的。另外,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几部代表性的论文集与专著<sup>④</sup>。

学术界对清代(往往包括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或某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存在这一萌芽的话,则对其出现途径与形式、发展程度与水平、发展迟缓的原因等进行分析。一般认为,当时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对其发展水平认识不同。有些人给予较高估计,如认为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资本主义因素已进入“原始积累”阶段。尚钺认为,乾嘉时期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邓拓认为,清初至乾隆时期,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达阶段”,在嘉庆至鸦片战争前,“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翦伯赞认为,尽管 18 世纪上半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烂熟程度,孕育着从明朝中叶以来就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但还“没有达到足以摇撼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程度”。也有人持否定意见包括对其中的某些行业、某些观点持否定意见。例如黎澍批评说:“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论文脱离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混淆起来,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工业资本主义,表现了显著的片面性,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稳固。”吴承明

① 参见郑振满《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分析——关于地主的家族与经济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清史论丛》第 1 辑),江太新《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历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樊树志《明清租佃关系的发展》(《复旦学报》1983 年第 1 期),吴量恺《清代的农民永佃权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4 年第 6 期),李三谋《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额租制的关系问题》(《求是学刊》1991 年第 2 期),周翔鹤《关于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一个分析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傅衣凌前揭书,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 年),方行前揭文;并参见月泉《“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暨庆祝李文治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中方行、魏金玉的发言,冯尔康《清代地主阶级述论》(收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年)。

② 参见傅衣凌前揭书,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刘克祥《试论近代北方地区的分益雇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柳柯《近代北方地主经营方式三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周翔鹤《清代台湾土地开发史上垦首、业主、佃首等名称的地理分布》(《台湾研究集刊》1991 年第 1 期)。

③ 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分别由三联书店 1956、1957、1960 年出版;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④ 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 年第 5 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1 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 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分别于 1990、1993 年出版。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 年。

认为,“在我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即棉纺织工业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近年来,章有义、李伯重、曹树基等也就“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反思<sup>①</sup>。

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人们主要是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懈、商品生产、“雇工人”的法律地位、雇佣劳动生产、庶民地主经济、佃富农经济等方面来论证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工商业方面主要是从纺织、矿业、盐业、陶瓷、造纸、造船、商人、行会等方面来论证的<sup>②</sup>。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迟滞的原因,一般认为在学理上应该是多方面的,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有不同的侧重点。或从封建政权、或从区域差异及乡族势力、或从经济结构、或具体从某个领域如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等一个或数个方面进行探讨<sup>③</sup>。

就大陆而言,20世纪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一定层面上是经典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反映,现在看来这一讨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不可否认,这一探讨极大深化了商品生产、区域社会经济、传统社会结构的研究,以该问题的讨论为契机,社会经济史料搜集与研究得到明显加强,也为近一二十年来的商品经济、市场、区域史研究起到了铺垫作用,同时又促使人们对以前的研究进行辨析与反思。如果说以前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主要是力图发现哪些部门哪些地区存在萌芽的话,那么,近年来的讨论则主要是对有无资本主义萌芽进行反思;以前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而现在几乎成为学术史问题;以前以此为契机对社会经济的讨论主要是在生产关系,而现在则日益重视生产力与流通等领域。

清代的社会生产 对清代前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的估计直接与晚清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相联系,如一些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是由或主要是由西方企业移植而来,强调此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微弱与中断,如林增平认为,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自然经济起了分解作用,“曾经在部分手工业和商业里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接踵枯萎凋谢,得以幸存的为数不多”。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也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同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没有直接的因果和传承关系,主要是直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结果”。而另一些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晚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途径或主要途径之一。如吴承明指出,“在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大部分都维持下来,并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汪敬虞主张,既不能无视资本主义萌芽与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的联系,也不能过分强调这种关系,认为前者是后者产生的主要途径<sup>④</sup>。另外,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也存在分歧。如章有义选取东北及海关报告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生产力下降的结论。刘克祥、陈争平也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极其缓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倒退”。而另一些人,如吴承明、刘佛丁的宏观分析,徐秀丽、郑起东就华北的研究,虽然也承认生产力变化的曲折道路,但从总体上均强调晚清时期经济增长、生产力(明显)进步。而清代以来农业生产发展水

① 参见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收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05页),章有义《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史料问题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曹树基《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② 关于此,请参本文所列资本主义萌芽专著与论文集。

③ 参见李洵《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洪焕椿《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傅衣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4年第1期),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吴量恺《试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清史论丛》第3辑),萧国亮《试论清代前期商业利润不能普遍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原因》(《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④ 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引文见第355页。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导论》,第22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09页。汪敬虞:《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平、有无“发展”，也是美国黄宗智、马若孟等人争论的焦点之一<sup>①</sup>。

黄宗智以“过密化”（此前也作“内卷化”）作为核心概念，论证小农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反思商品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无发展的增长”或“过密型增长”。他的研究在大陆引起了不少回应，在肯定其成绩之外，一些人则以不同形式进行商榷。例如，“过密化”是以人口压力为背景、为逻辑前提的，强调“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但李伯重则对“人口压力”等基本概念提出质疑，范金民亦反驳说，影响农家的收入与生产，不仅有“单位工作日报酬，又有工作日数的利用率”，“既有利用土地的收入，又有土地以外家庭劳动的收入”，他们均从总体上肯定江南经济的发展<sup>②</sup>。

手工业、加工与制造业。一些学者对手工业的总体发展状况及某些行业进行了专题研究，严中平除对棉纺的系统考察之外，又对滇铜的开采、组织管理、生产技术等进行了具体考察。彭泽益通过对江南织造的研究，揭示官营丝织业在清代前期的主导地位及对民营丝织业的压制，他还对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发展阶段进行了总体分析。由于某些行业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所以一些研究选取了特定地域进行考察，如四川井盐业、景德镇制瓷业等。如同农业一样，80年代后期以来，学者们在考察生产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对生产力的研究，如范金民、李伯重等对江南丝织业、“早期工业化”的深入研究。史建云、徐建青等对棉纺、造船及清前期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分析，等等<sup>③</sup>。尽管对洋务运动中所办企业的意义与性质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80年代以来，不少人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在推进中国近代化、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时加强了对各企业的典型分析，关注新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之下传统经济（因素）的地位及其变化<sup>④</sup>。

商品经济、市场与金融 在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已讨论了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商品生产问题，但当时的讨论是在资本主义萌芽论、批判中国停滞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论及商品生产，但在总体上却强调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改革开放以来，继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后一次讨论高潮之后，学术界再次就商品经济进行了专题讨论，其主流观点是，传统经济（有些人则说地主制经济、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有些人说商品生产）并不冲突，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但在具体评估上则有不少分歧：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本质联系，或说既相

- ① 参见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刘克祥、陈争平前揭书（第25页）、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80页）、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8—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 ② 参见黄宗智前揭书，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李向军《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简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7—340页）。
- ③ 参见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57年）、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彭久松、陈然《中国契约股份制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钰欣《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中官窑地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江南小农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徐建青《清代前期的民间造船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清代前期的榨油业》（《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清前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与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④ 参见张国辉《甲午战后四十年间中国现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和不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与工业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姜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排斥又相补充,有人提出要具体分析、不可概而言之,有人则坚持地主制下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浓厚的封建性<sup>①</sup>。至于具体研究论著则数量繁多。

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的市场是学术界近年来十分关注的论题,傅衣凌在50年代较早地考察江南市镇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明清市场的论著接踵而至,除总体概论外,主要是对区域市场的具体分析,海外论著也受到重视<sup>②</sup>。学术界普遍肯定清代市场变迁及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意义,但在估计发展水平时存在一定差异。一部分人充分肯定清代市场的发育程度。如姜守鹏认为,清代北方的劳动力市场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劳动力价格随供求关系而变化。邓亦兵认为清代的粮食贸易规模超过前代,是靠市场调节的。许檀不仅从区域考察出发,对明清山东商品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对整个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发展动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sup>③</sup>。另一种则持保留态度。孙竞昊认为明清江南的劳动力市场很不健全与成熟,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吴慧等认为,其实在清代的粮食调剂中,政府通过籴仓米等诸多措施,国家发挥了最大可能的调节作用,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sup>④</sup>。还有一种则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例如吴承明指出,从商路、城镇、商人资本、长距离贩运以及市场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国内市场显著扩大,但粮食、布等仍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在长距离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小,从而造成了市场的狭隘性与长距离贸易的局限性。方行认为,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主体是市镇贸易与墟集贸易,市镇以其发展程度分为三种类型,即保障供给、商品集散以及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市场。刘志伟具体考察了清代广东商品经济的几个质变,如由以进口为基调转变为以出口为基调,由相对独立的市场转变为有机的市场网络,瓦解自给生产而转变成为商品生产。陈春声通过对广东18世纪米价的计量研究,既指出市场机制的存在,又强调非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赵世瑜还从文化的视角进行讨论,指出人们以前只注意城乡对立的一面,其实从民间文化考察却存在着一致性<sup>⑤</sup>。

金融方面。清代的货币(包括外币)与金融机构变迁长期以来都是研究重点,有若干论著问世。在清代金融研究中,票号一般认为是山西商人首创,但具体出现时间则存在不少争议,除明代说外,清代说中就存在顺治说、乾隆说、嘉庆说、道光说等,今人多持道光说。高利贷的存在及其评价方面,以前的研究多强调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封建压迫与经济剥削的例证。但80年代以来认识发生变化,方行强调,不能模糊其根本职能、无视其存在的客观经济根据而片面扩大借贷资本的寄生性,主张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加以考察。张忠民从宏观上论说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刘秋根则对明清高利贷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分析,认为其在

- 
- ① 参见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魏金玉《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分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1988年1、2、3期)。
- ② 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施坚雅等人的市场研究,除《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的节译本)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又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全译本(叶庭光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另外还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③ 参见姜守鹏《明清时期的北方劳动力市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3月3日)、《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④ 参见孙竞昊《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1期),吴慧、葛贤惠《清前期的粮食调剂》(《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 ⑤ 参见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刘志伟《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当时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不能否定<sup>①</sup>。其他如清代的生息银两等,也展开了系列研究。

商人与商业资本 学术界对商人的考察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的。一是清代(往往包括明代)的地方商人。这一研究起步较早,80年代以来成为热点,出版了若干论著<sup>②</sup>。二是区分不同的商人性质、进行分类研究。如官商、民商、盐商及私人海上贸易等<sup>③</sup>。三是进行某专题研究与资料收集。如经营方式、商书、商籍、商人构成以及晚清商会等等<sup>④</sup>,徽商、晋商也有专题资料出版。四是结合相关问题的综合研究。如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商品化、商人与商业发展,商人与社会变迁等<sup>⑤</sup>。其中商业资本一直是研究重点,而讨论的核心是商业资本的转化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这是产生并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基本上未转化为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或从官府的需求掠夺出发,认为各种捐输、盐课负担以及官吏的需求消耗了绝大多数商业资本,商人可支配的商业利润相当有限;或认为大多数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低于商业利润率、土地资本的某些固有属性对商业利润有巨大的吸引力<sup>⑥</sup>。这又涉及到商人购置土地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商人兼并土地,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不仅造成土地集中,而且使商业资本受损、是大量商业资本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的主因。但有人指出,对此应作进一步分析,刘秀生在对商业资本的含义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商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及其作用,认为商业利润的分割未必损伤商业资本,重视研究商业资本自身积累及其在流通、生产中的具体形式与整个过程。也有人研究认为,陕西商人在总体上很少购置土地,但未必更多地投资产业,因此应进一步探讨:购置土地,是采取什么方式经营的?未置土地,商业利润又作何用?既未置地、又未投资产业,也不是先进的商业资本类型<sup>⑦</sup>。一些视角的转换则有助于深化商人与商业资本研究,如对地方商人的考察中大多以商人的地望为依据,多注意其在本地的经商活动,但其之所以在当时显赫于世,恐怕正在于走出故土,异地经商,从客贩而变为侨居,因此此类分析颇有意义。又如,以前大陆的商业资本研究多以西方商业资本的发展方向为参照,在开拓中国商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方面存在不足,也往往离开社会环境而苛求中国商人,而西方学者则以“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等概念来讨论19世纪的

- ① 参见魏建猷《清代外国银元之流入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清史研究集》第4辑),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张国辉前揭书,韦庆远《康、雍、乾时期高利贷的恶性发展》(收入《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高利贷与社会再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② 参见傅衣凌前揭书,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华的系列研究,如《清代河南商品经济与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十一》等(《清史论丛》1994年号),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李纲《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 ③ 参见商鸿逵《清代皇商介休范家》(收入《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韦庆远《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收入《档房论史文编》),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清史论丛》第4辑),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邓亦兵《清代前期的民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④ 参见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许敏《试论清代前期铺户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封越健《清代前期商人的构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现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梁洪生《吴城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⑤ 参见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唐力行《商人与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范金民前揭书,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
- ⑥ 参见刘永成、赫治清《清代前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组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思治、金成基《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萧国亮《试论清代前期商业利润不能普遍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原因》(《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黄启臣《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 ⑦ 参见刘秀生前揭书,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中国商业“革命”<sup>①</sup>。

在专题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近年来也出版了一系列通论性社会经济史著作,如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方行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等,反映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 (三) 社会、思想与文化

**人口研究** 1949年之前,一些学者对此已作了可贵的探索。如早在20年代,陈长蘅已注意到清代官方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罗尔纲在30年代也指出,清初人口统计“是不可靠的”,乾隆五年之后随着赋役制度改革与保甲的推行,“户口的数目才大致得实”,后来还提出了“人口压迫”问题<sup>②</sup>。文革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的加强,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人口史研究成为热点,并一直持续至现在。

在80年代前中期,大陆清代人口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人口数量的推算问题。或从丁、口的比例出发,以人丁数来推算人口数,或从户、口的比例来推算人口数,还有从某一人口数或人丁户数进行推算与上溯、注意选择某一增长率。但推算中,如何选择具体比例与增长率则存在差异。有人强调清代“丁”的复杂性、对其数量的可靠性表示怀疑<sup>③</sup>。学术界大多承认清代前中期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人口压力的存在及对社会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一些人对此则提出质疑。

关于人口增长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山区开发、土地垦殖、美洲新作物的种植,也包括清朝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策。但对后一原因,有学者则提出,摊丁入地期间恰是清代人口增长最慢时期,强调玉米番薯种植、山区开发对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李中清对西南的人口研究又发现,从康熙至道光年间,该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机会的增加,不是农业耕作的变化和耕地的扩大。对于清代前期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压力出现,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等观点,一些学者也以华南、江南为例提出商榷与反驳<sup>④</sup>。

在海外,何炳棣于50年代即出版了研究专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这一标志性成果长期以来对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常常成为相关研究的论述依据,但由于中美学术交流的阻隔与迟滞,这一成果至80年代末才在大陆翻译出版。该专著的显著特色是从人口资料的考辨、人口登记的制度变迁来探讨历史上的人口,进而对人口变迁的主要原因进行考察与分析。90年代之后,大陆相继出版的有关人口史专著,如复旦大学完成的人口史与移民史,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等,均注意了对何炳棣研究成果的吸收,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除人口数量之外,人口结构、人口流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另外一些学者的专项人口史、区域人口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注意对此前研究成果的辨析、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加强了对档案资料

- ① 参见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李华《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龙登高《从客贩到侨居:传统商人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该书原名为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若直译的话,则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 ② 参见陈长蘅《中国近八百八十余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后之调剂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8号,1927年),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页)、《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年)。
- ③ 参见郭松义《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吴慧《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潘喆、陈桦《论清代的人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傅筑夫《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晁中辰《清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 ④ 参见方地《清代丁税对人口作用我见——兼论清代人口大增长原因》(《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刘志伟、陈春声《应重视传统农业发展的社会空间》(《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李伯重、范金民前揭论著。

的搜集与利用<sup>①</sup>。说到移民,则相应的有移民组织,尽管其名目繁多,功能各异,侧重点不同,但大多都有联结乡谊、患难相济的目的,也部分地反映了人们的乡土情结与意识。又由于这些组织与行业组织的交错共存,而各自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于是诸如会馆、公所、行会等,不仅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之一,而且观点认识也存在一系列分歧<sup>②</sup>。

**社会等级** 学术界对清代社会等级的划分见仁见智、视角多样。如按照阶级斗争观,则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者如皇室贵族等,后者如佃户奴婢等,其中“孔府”被作为贵族地主的典型予以分析。但若对地主进一步具体分类则纷繁多样,除了所谓的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外,李文治将其分为贵族、缙绅与庶民地主;来新夏分为旗地、缙绅、商人、庶民、经营地主;冯尔康分为平民、学校、宗族、善堂、寺院、商人、官员衿士、皇室地主等等<sup>③</sup>。若干概念的引入使用、某些专题的探讨分析,深化了社会等级等方面的研究。

**地主与农民。**在经典的理论中,地主与农民构成封建社会(近年来学术界更多地使用传统社会)中两大阵营,分别代表着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剥削者、使用者与被剥削者。但地主“乡居”与“城居”、是租佃地主还是经营地主则涉及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同,是当年考察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视角与分析手段。傅衣凌较早地使用“乡族”地主这一概念,这种以非个人、非单个家庭的形式占有土地或拥有土地使用权、享受其收益,其实往往为某个人、某些人所把持,相对而言,地权不易流动、地租收入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也有集体福利与救济性质,但在根本上是为维护宗法社会与社会教化服务的,因此,“乡族”地主不仅属于经济范畴,又是一个社会控制的概念。又如农民,有学者就此研究后指出,农民既是耕作者、一种职业,同时也代表着一种身份、一种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来自于农民,但并非农民所仅有、也未必在耕作者身上最浓厚<sup>④</sup>。

**“凡人”、奴婢与“雇工人”。**清代“凡人”的内涵十分复杂,经君健研究指出,“凡人”是清代人数最多、最为复杂的社会等级,包括有不同的阶级与阶层,其中佃户与地主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但佃户的地位又随着田主等级地位的高下而相反变化,因此清代的主佃关系是单纯的契约关系还是具有主仆名分需具体分析,不能概而言之。韦庆远等人对蓄奴制度、产生原因、奴婢来源、身份地位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傅衣凌不仅较早地注意到此类问题,而且倡导社会调查研究。“雇工人”是明清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翟同祖较早地对这一等级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法律地位介于奴婢与常人之间。此后,魏金玉、经君健对其法律地位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相联系,经君健还就清代的“贱民”等级进行了专题研究<sup>⑤</sup>。近年来,清代的法律,如习惯法及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研究受到重视,已有不少论(译)著问世,从而拓展、深化了清代法律与社会变迁及其关系的研究<sup>⑥</sup>。

①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清、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另外,台湾学者刘翠溶利用族谱等资料对人口与移民的分析,是继何炳棣研究之后的重要突破。

② 参见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程歆《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③ 参见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李文治《地主经济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纲》(《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来新夏《关于清代前期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冯尔康《清代地主阶级述论》(后两文收入《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

④ 参见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等前揭书,景甦、罗仑前揭书,秦晖、苏文前揭书。

⑤ 参见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陈支平、林仁川《福建华安仙都的蓄奴制调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翟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前揭书,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 参见经君健《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宗法关系、婚姻与家庭 早在三四十年代,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已对中国的家族制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分析,1949年以来,家族制度也一直作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予以讨论。就历史学界而言,人们重点讨论了宋明至清代家族制度的形成原因、演变趋势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将其视作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有人从其他视角出发,以家族组织来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演变趋势、分析其与基层社会经济变迁的互动关系。例如郑振满从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行为准则出发,将家族组织分为继承式、依附式与合同式三种基本类型,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演变趋势是: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以及财产关系的共有化。陈支平则通过对福建家族制度的纵向考察,从中探寻家族制度与地域社会文化演变之间的关系,他还具体考析了族谱的内容、体系及其实质。刘志伟通过宗族对祖先谱系重构、宗族与沙田开发的典型分析,提示宗族组织及其功能之所以实现的文化形式、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探讨宗族文化的内在意义。近来他与科大卫合作,从超越“血缘群体”的视角考察明清时期华南的宗族问题,认为其发展是明代以来国家政治分化与经济发展的表现,是宋明理学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国家秩序的过程。李文治、江太新从封建土地所有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宗法宗族制及其功能与作用,坚持土地关系的变化是宗族宗法制发展变化的根源。其他如徐扬杰对家族制度的系统探讨、冯尔康对宗族与祠堂、朱勇对宗族法、张研对族田、范金民与王日根对义田的研究等等<sup>①</sup>。近年来学者注意对清代婚姻家庭的研究,而且档案资料得到大量利用。如郭松义对清代婚姻关系考察与分析,王跃生对18世纪婚姻家庭的系列研究,阿风对徽州妇女婚姻财产关系的探讨等等。清代的少数民族婚俗及其演变研究也得到加强,如定宜庄对满族妇女婚姻形态、社会生活及其演变的研究,而李伯重、赵世瑜等人也对传统的男耕女织、女主内、严闺阁之说提出质疑与补充<sup>②</sup>。

社会生活、社会控制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加强了对清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如饮食、风俗、宫廷等方面均有论著问世。而一些学者则将注意力放在发掘社会生活的真正意义与实质内涵。近年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大多注意基层控制问题,并从不同视角来分析。例如前述郑振满对闽台家族组织的研究所揭示的社会变迁。赵世瑜对庙会的研究,他认为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不仅是对宗法礼制的一种反动,而且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他还从社火仪式表演来分析其功能意义,揭示“社”在基层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并就某些社会心态进行研究,从中揭示社会变迁及其原因。又如常平仓等,学术界一般认为属于社会救济措施,而陈春声以广东为例研究,认为清代常平仓谷是以捐纳监谷为主要来源,许多地主商人借此进入统治阶层,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减轻受灾程度,防止饥民骚动,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控制措施。随着常平仓、社仓的逐渐瓦解,义仓代之而起,由官方所办设于县城的常平仓、由官绅合办设于县城以外的社仓以及完全由士绅控制设于乡村的义仓在清代的前后设立、功能的依次加强,体现了清政府基层社会控制的减弱,基层控制权的下移。游子安、包筠雅论述了明末清初功过格的流行、善书对社会风气的匡正与引导,发掘了其中的中国人注重道德内省、积善除恶、累积功德的思想观念。李向军对清代救灾制度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其措施全面、立法完备、执行严格、效果显

① 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左云鹏《祠堂族族长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明清以来家族制度对社会生产的阻滞》(《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丛》第4辑),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宗族与沙田开发——番禺沙湾何族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商务印书馆,1996年),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王日根《清代义田的发展与成熟》(《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义田及其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社会功能浅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② 参见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王跃生前揭书,阿风《试论明清的接脚夫》(《明清论丛》第1辑),《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利与地位》(《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定宜庄《满族妇女婚姻制度与社会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赵世瑜《明清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原学》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著<sup>①</sup>。

秘密结社与民间宗教 其中天地会的起源及其宗旨长期以来存在争议。天地会的创立时间有多种说法,除明代说、雍正十二年说、乾隆三十二年等说之外<sup>②</sup>,还有康熙十三年说、乾隆二十六年说以及未有具体年份的过程说。近年来讨论最多的还是后三种观点。

早在20年代,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一书中,就提出酝酿于永历帝及郑成功,正式成立于康熙十三年。后来,罗尔纲结合天地会内部文献与清代官方资料对此加以论证,而且认为其宗旨是“推翻满清统治”。60年代,魏建猷认为天地会是传统的反封建农民组织,戴逸认为是旧式农民组织,但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此后邵循正撰文,否定天地会有明确的宗旨,蔡少卿则提出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sup>③</sup>。至80年代,秦宝琦、赫治清发表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分别论证乾隆二十六年与康熙十三年说。秦宝琦认为,乾隆二十六年提喜即洪二和尚创立了天地会,其宗旨是互济互助、自卫抗暴,并无明确的抗清口号,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而赫治清认为,康熙十三年达宗和尚正式创立天地会,地点是福建漳浦云溪张高溪庙,其宗旨是“反清复明”。邓孔昭等人撰文,也持该说<sup>④</sup>。此外也有人主张过程说,如张兴伯认为,天地会起源于清初四川,后扩大到闽粤一带,以破产农民等劳动者为主。曾五岳认为,天地会从起会到成熟是一个逐步发展过程,起始时间大约在康熙三年至十三年,雍乾时期起伏不定,乾隆二十六年进入成熟阶段<sup>⑤</sup>。

另外,清代其他民间宗教、秘密会社等也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如蔡少卿对会党史与秘密社会,喻松青对白莲教,马西沙对八卦教、李尚英对民间宗教与结社,林国平对三一教等。80年代以来,学者们普遍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并注意各种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如陈旭麓对会党兴起社会背景的分析,秦宝琦对秘密教门与其他组织的考察,喻松青、马西沙对民间宗教教派的总体分析等,在某些研究中也适时地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从而使清代民间宗教与秘密会社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sup>⑥</sup>。又如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大陆学术界

① 参见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美食·美味·美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万依等《清代宫廷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明清华北的社与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两种不同的政治心态与明清胥吏的社会地位》(《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1期),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陈春声《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清代广东的社仓》(《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士绅与清末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咸丰以后广东义仓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游子安《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② 如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认为“始倡者为郑成功”,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一文倾向于雍正十二年,但并未否定康熙之说(以上两文均收入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不过萧一山后来在《清代史》中说:天地会“成立大约在康熙十二年”(见《清代史》第44页)。乾隆三十二年等说,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前言》。

③ 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第107—108页),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原刊于1934年11月的《史地周刊》,收入《天地会文献录》),魏建猷《试论“天地会”的性质》(《文汇报》1960年12月20日),戴逸《关于天地会的若干问题》(《文汇报》1961年1月20日),邵循正《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54—58页)。

④ 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邓孔昭《从康熙前期福建会党活动的几条史料谈天地会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⑤ 参见张兴伯《天地会的起源》(收入《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曾五岳《天地会创始人及起会年代考证》(《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此说实际以台湾学者庄吉发最具代表,见所著《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1年)。

⑥ 参见蔡少卿前揭书、《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尚英《源同流分——民间宗教与结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秦宝琦《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喻松青《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比较重视对其直接源流的考察,或认为来自于私团、拳会或团练,或认为是秘密会社或秘密宗教组织,进而认为是多源合流而成。而美籍学者周锡瑞则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历史文化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揭示出义和团的起源实为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互动”的结果<sup>①</sup>。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起步较早,但80年代以来出现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重视田野考察与跨学科研究,从中探讨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基层社会变迁。例如,陈春声不同意将民间信仰的研究重点放在对神祇的追溯及传说真伪的考辨,主张在此基础上发掘民间信仰的社会内涵及其与地域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选取了广东樟林三山国王信仰进行田野考察与研究。刘志伟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传统社会的整合及其变迁过程,他根据广东的北帝信仰研究指出,一方面地域社会文化整合到国家大传统之中,同时也是国家神明的地方化过程,并选取了番禺沙湾进行田野考察。赵世瑜倡导民间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从中发掘民间文化现象背后的实质内涵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如以京师的正祀与民间信仰研究为例指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温和的互动,而不总是激烈的冲突,明清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发育程度在各区域是不同的,华北就存在着地区特殊性。郑振满详细地考察了社区神庙的演变过程,即村庙祭典组织向地缘组织的演化、基层血缘关系的淡化与地缘关系的加强,并与相关的研究理论相回应。他指出,不能将祭典组织看作是纯粹的宗教组织或是存在于某些地方的特殊现象,它广泛地存在于传统中国并具有社区行政组织的功能,并选取了莆江平原作为田野考察的重点<sup>②</sup>。其他如梁洪生、邵鸿等对江西乐安县、钱杭与谢维扬对江西泰和罗家村,均注重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察进行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学术思想与文化变迁** 其中乾嘉学派、文字狱是考察重点。关于乾嘉学派产生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与当时的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密切相关。来新夏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是由于康乾时期的政治高压与经济繁荣。学者一般认为,清朝前期大兴文字狱,使得部分学者转向繁琐考据,这是乾嘉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另一种意见注重从社会历史阶段进行分析,不同意将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相联系。李洵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并不以康乾盛世为基础,而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为了社会的改革。周维衍认为与当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统治者倡导封建学术有直接关系,而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还有一种从学术思想的发展逻辑来解释。陈祖武认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必须从中国儒家学说自身的矛盾性来认识,特别是批判理学时的法古倾向及其向考证经史的转变,为这一学派的形成提供了逻辑依据。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以前多持批评意见,认为这些清代学人埋头于繁琐考据,未能学以致用、探索规律,但近年来的认识与此不同。如暴鸿昌指出,不能以考据学来概括乾嘉史学,后者还有考据以外的其他内容,而考据学则多为经学家所为。郭康松从乾嘉考据学的主要学术规范进行分析,认为该学派改变了传统学术重思辨轻资料的倾向,是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变的标志。高翔甚至认为18世纪中国知识界存在着反传统倾向,如主张人性自由、推崇独立思考、否定君主专制等,与同时期的欧洲启蒙思想有相似之处<sup>③</sup>。对于晚清部分,则重点考察文化变迁包括传统学术思想的地位与影响。汤志钧指出,晚清时期经学尽管在内容等方面有所变化,但其地位与形式却没有变化。庞朴认为,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变迁表现在甲午战争之前器物层面上的向国外学习,此后则在制度层面进行变法。龚书铎则考察了文化构成、内在结构与部门结构的变化,他指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由单一的封建文化转变为多种文化并存,封建伦理纲常进一步削弱,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以至资产阶级文化体系的最终形成<sup>④</sup>。关于文字

① 参见路遥前揭文,路遥、程献《义和团运动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第99—130页),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参见陈春声《社神崇拜与社会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均见《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赵世瑜《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寺庙文化初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会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

③ 参见来新夏《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李洵、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信》(《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周维衍《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暴鸿昌《乾嘉史学辨析》(《北方论丛》1990年第3期),郭康松《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高翔《论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④ 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龚书铎《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狱,学术界以前常常认为文字狱是清朝禁锢思想、实施文化专制的工具。8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对若干“文字狱”(如《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进行重新考察与辨析,认为各案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只不过以文字狱为借口而已。同时认为对文字狱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能估计太高。有人认为,如果从严格的文字狱概念出发,许多事件并不能归之于文字狱,文字狱并未使清朝的统治强化到什么地步,也没有扼杀当时的学术与思想。更有人指出,清朝思想上的高压并不表明思想领域的沉闷,从学术史而言,乾嘉思想并不比开明专制时代如汉唐时期逊色<sup>①</sup>。

学术界对明末清初三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予以很高评价,而且普遍肯定其在反对君主专制、发展唯物主义思想等方面的成就,争议主要集中在这一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如何恰如其分评价方面。侯外庐曾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已超出封建社会自我批判的范畴而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李泽厚对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也评价甚高。王俊义、黄爱平亦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与发展。但与此观点不同,如嵇文甫认为,黄宗羲并未主张从根本上废除君权,只是主张限制君权,这种绅权政治与民权政治差距甚大。关于其工商皆本思想,冯尔康认为,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是对历史上这一认识的升华,但他又将当时代表最先进生产方式的机坊生产视为末业,说明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徐凯指出,明清之际的新思想与观念只不过是民主思想的萌芽,不宜评价过高<sup>②</sup>。

关于清代学术史,陈祖武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学案史、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清了其发展脉络与变化趋势。另外也有史学史著作出版。文化交融方面,王钟翰分析了清前期满族政治思想文化与汉文化的逐渐融合,指出清代文化是满汉文化的化合物,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郭成康则转换视角,以满族为核心来考察其重塑汉文化的过程,深化了满汉融合的研究。戏曲家、西洋艺术的传入等,学术界也分别有专题研究。近年来,地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冯尔康、范金民等分别就区域人才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行了统计与系统分析,而杨念群则从地域文化的视角考察知识群体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异同,桑兵考察清末知识界的社团及其活动<sup>③</sup>。

以上,我们就20世纪清史研究的主要线索、时代特征以及重要的学术积累进行了简单勾勒,由于本文不是也不能就大部分论著进行罗列与评述,所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近百年的清史研究从起步到走向成熟,尽管其间有曲折与迂回,但研究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新的世纪里,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新方法的借鉴与应用、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在前辈学者的精心培育下,新一代学者将挑起研究的重任,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21世纪的清史研究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钞晓鸿,副教授;郑振满,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责任编辑:仲伟民)

- ① 参见孔立《论清代的文字狱》(《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冯尔康《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述论》(《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王树民《〈南山集〉案透视》(《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许苏民《也谈清学史:思想与思想家——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 ② 参见赵俸生《顾亭林与王山史》(齐鲁书社,1986年),陈祖武《旷世大儒顾炎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55页),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0—283页),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思想特色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嵇文甫《黄梨洲思想分析》(《新建设》1959年第12期),冯尔康《关于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3期),徐凯《明清之际社会变革浅析》(《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 ③ 参见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王钟翰《清军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1期),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何龄修《明清的隔壁戏》(《清史论丛》1994年号),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及续编与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997、1999年),沈定平《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冯尔康《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